觀察

第三卷　第十八期

專論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吳世昌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樊弘

論不滿現狀　朱自清

美國通信　柴那門的機會　史超禮

生活與文化　論師儒　費孝通

觀察通信

乾坤一擲（南京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戰火西延·全川設防（成都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北平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通信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　劉建緒

週末闌欄　蘭茵河底的魏瑪陰影　費孝通

文藝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

讀者投書　左鞭右打　我在犯法中求生　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就不應當活嗎着？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稜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群

撰稿人

讀者投書

左鞭右打

一

編者先生：自從先生在觀察三卷九期發表了一篇評蒲立特的訪華報告之後，先生的立論正確和放胆敢言，雖獲得無數讀者的共鳴，但由於觸犯當局忌諱，貴刊竟遭受到莫大威脅，被迫停刊之謠，從十一月初旬以至末旬，傳之不絕，香港華僑星島兩報，幾次刊載這樣的專電，令人讀後深感不安。隨後更傳說先生離滬他往，貴刊已無人負責，彷彿貴刊已有不得不停刊的趨勢。但結果貴刊仍是照常出版，甚至並未脫期，我們的心裏才安慰一些。但瞻望前途，貴刊今後處境顯然將更困難；先生的處境也是一樣！

有什麼好說呢？在國共雙方武力決鬥之下，愛好自由民主，尊重理性的老百姓眞是左右不討好，備受雙方夾擊。卽以貴刊而論，國民黨固然不喜歡，中共也覺得有點礙眼，因爲他們已堅決不願同復政協路線，不惜一切代價，企圖推倒現政權。因之，他們對政府固然大肆攻擊，就是一切不同情政府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認爲是革命途上的絆脚石，這因爲自由主義者并未參加他們的鬥爭，甚且顯然妨礙到他們用武力去推翻現政權的企圖。他們在過去及現在，都不停地抨擊施復亮先生所倡導的「中間的政治路線」，近來又不高興周鯨文主編的「現代批評」。貴刊自查封的消息傳來之後，中共主辦的華商報也曾登載過兩篇文字（其中一篇是通訊）說及這件事情。當然他們藉此攻擊國民黨之不尊重自由民主，但字裏行間，他們顯然并未有尊重貴刊之處。今日華商報更刊載上海國新社的通訊，說貴刊已爲陳立夫所利用，甚且說，先生曾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裏請罪悔過，這對先生未免是一種侮辱。現在我將該段新聞抄錄如下，這新聞是登在今日該報第一版上的。

（國新社上海航訊）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帝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爲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惟恐得罪得太厲害，又順便罵一下蘇聯，滿以爲這樣可以混過去了。殊不知，這種罵法不是曾經當過中央日報主筆的態度，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爲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等公館里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爲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加以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贖前愆，是否如此，那就需要『觀察』的讀者留心觀察了。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國新社的通訊有很多是道聽途說，完全靠不住的。對於這篇通訊，我認爲更是荒謬，因爲祗要對先生近來所發表的言論看來，先生決不是像這段新聞中述的那種人。但中共的報紙居然將它刊出，是則他們對貴刊的態度如何，可以想見！

先生光明磊落，對於這些謠言，當不置意。但是我現在感到嚴重的，倒是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之下，那些在國共雙方夾擊之下的愛好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今後究竟向那裏走？

跟着國民黨去「戡亂」，大家不肯，跟着中共去「鬥爭」，大家也未願意這樣做法；眼看國家已面臨毁滅的危機，不能閉目不管，但又不能有所作爲；就在這樣徘徊苦惱的當兒，卻自然而然地成了國共雙方的敵人，遭受到兩面的壓迫。

坦白的說，對於施復亮先生所倡導的中間政治路線，我很景仰；但時至今日，我的信念總不免有點動搖，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個個都希望和平息爭，民主統一，中間路線不愁找不到羣衆基礎，可是如何使散沙般的羣衆團結一起，成爲可以左右大局的力量，就很困難了。在這個刀槍撕殺的年頭，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團結抵抗有刀槍者的壓迫眞非易易。現在中國的情形，正如萇時進先生在貴刊三卷十一期上所說：國共雙方都是崇尙武力，不要人民的，在此情形之下，你欲想扭轉局勢，祗有不辭犧牲，以武力對抗武力，庶幾可以使內戰英雄回心轉意，否則，你如何可以令內戰停息？（除非一方打倒對手）在刀槍劍戟之下，手無寸鐵的國共以外第三方面人士顯然是力量軟弱，這種說法，雖或不很正確，但有組織然後有力量，散沙般的羣衆如何能發揮力量？人數雖多而無團結終是無用的。但問題來了，在國民黨區內，言論上反對「戡亂」都難存在，你如何進一步團結羣衆去反對他？至於中共區內更不必說了，簡直不許反對他，毫無言論集會自由之餘地！

跟着國共後面走既不甘願，中間路線又不易建立起來，埋頭不管國事又做不到，苦悶彷徨更是傷心而一無是處，今後的自由主義者究竟往何處去呢？目前很多青年朋友都談起這些問題，大家苦悶不堪。

梁子奇　十二月十五日　香港

二

編者先生：貴刊査封之謠，雖已過去，但據我的直覺，恐怕現在已有人對先生作集中的攻擊了。近出版的中央週刊上有一篇「觀察『觀察』記者」，謂先生「必將爲社會所揚棄」。另外有一本最近創刊的週刊，創刊號上祗有兩篇論文，第一篇是「評周炳琳等四十八人的『我們對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兼論萇時進的『感想』」。第二篇是「一個觀察的讀者觀察『觀察』儲安平」，長達八千字，說先生「奸詐、陰狠、投機」，「沒有一點心肝」，『沒有一點人性』。把先生罵得狗血噴頭，茲將該文剪下，奉上一閱。

王愼甫　十二月十七日　南京

我在犯法中求生

編者先生：卽使抹殺事實，也無法掩飾我在生活中所感到底痛苦和恐懼；尤其精神上所受底刺激和苦楚。邊疆特殊情形和不合理底現象，毁滅了我服務邊疆底理想和熱忱，現實底生活環境把我打入苦惱和悲憤底深淵，迫使我在犯法中求生。

我是輜汽兵團底駕駛兵，在盛世才統治權結束，新疆鐵幕揭開後，我抱着一個美麗底理想和好奇底心情，踏進這西陲遼遠底國土，在古西域底天山南北間工作。

自從伊犂事變，伊、阿、塔三區特殊化後，新疆底社會經濟顯然激起了急劇底變動，跟內地一樣，物價像脫了韁底野馬，新省政局底動盪，更加劇它狂奔底速度。如今，卽以靠近內地底東疆哈密而論，米價已售到每斗（四十斤）新幣十二萬元（合國幣六十萬），麵粉也售到每百斤新幣十萬元（國幣五十萬）猪肉更自每斤四千、六千而漲到現在底八千（國幣四萬）了，由內地來底日用品，更昂貴得驚人，當地政府對平抑物價也因失去信心而放任了，新疆原是冒險家和投機份子底樂園啊！

我們底待遇，過去還有邊疆加給，現在卻和內地一樣了，雖一再改善調整，但和物價對比，（下接十六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平寄六萬五千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九萬元　航掛12萬五千元
半年（廿四期）平寄十三萬元　掛號二十萬元　航平十八萬元　航掛廿五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資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八期
卅六年十二月廿七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樊　弘：北京大學教授
朱自清：清華大學教授
史靚禮：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劉建緒：福建省政府主席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吳世昌

今日中國政治之不能立刻納入民主軌道，並且在望得見的將來也望不見中國政治會民主起來，我想除了當前的許多現實原因，已爲時賢所經常討論者外，尙包括着幾個積重難返的因素。第一，最明顯的，從中國政治的歷史看來，不論在思想上或史實上，我們毫無民主政治的憑藉。其次，如果要探索這個現象的原因，又包括許多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在交通不便的時代要統治一個幅員廣大的中國，而且必須維持統一的局面，非用極專制的中央集權方式不可。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最大多數的納稅人，政治費用的眞正負担者，幾乎永遠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幾點，雖然不是今日中國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全部的原因，却是主要的原因。

近來有的學者愛說中國古代也有民主思想，甚至於民主政治。如果是爲了談民主是時髦，變爲「當世之顯學」，所以也來談談，或者因爲愛國心切，不甘示弱於洋人，那就不必深論。如果因爲對於民主的涵義根本不曾了解，不懂得西洋所謂民主是什麼一回事，人云亦云，强爲比附，則雖有辭而辟之的必要，也還不足深責。但如果心知其非而想用「狸貓換太子」的手法，以阻礙中國的進步，隱然爲不民主的政治辯護，那就其心可誅了。我曾經在別的論及中國文化問題的篇什中說過，尙書中的『厥作民主』是爲民之主而非尊民爲主。『「民」爲邦「本」』，『天聽視我民聽』，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其他類此的思想，直至最近傅作義將軍那一套辦法，都只能說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這一字之差，是不可以道里計的。馮驩爲孟嘗君擅自燒了老百姓的債券，他的動機和目的都不在爲老百姓謀幸福，而是爲孟嘗君「市義」，這個「市」字是「政治資本」的確詁。我所以說：「民本」之「本」，亦卽近人所謂「政治資本」之「本」，「主」動者仍爲統治者，而不是被當作資本的「民」，這是明白得無須多說的。在思想和文字上旣然如此，在歷史事實上中國人民更從未夢見可以作主。傑出的政治家如子產之流，因知尊重「輿論」，但不是他不能禁止，而是不願禁止。人民不因駡政府而遭殃，是運氣，不是權利。何況一個鄭僑敵不過十分之一個嬴政，何況鄭僑不世出而嬴政以百計？人民有時以所謂民謠來暗示一種願望，正在興起的野心家利用之以爲順天應人的讖語，統治者則自古到今，一律認爲謠言惑衆者應殺無赦。過去所謂郅治之世，不過如周豫才先生所謂，大戰亂大屠殺之後，給人民以僅够活下去的生活條件而已。（手頭無書，大意如此。）在這裏我還想加一句：讓人民可以活下去的目的是培養稅源，而未必眞有所愛於人民。這也可以說是民本思想的一部分。

我曾經想過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爲什麼如此其困難。它的歷史的原因，似乎不在中國之不易統一，而在統一的代價太大。司馬遷在記述了嬴秦帝國崩潰以後的長期內戰以後，不禁太息道：『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其實說劉邦「以德」也是天曉得，惟有這一個「難」字是司馬遷眞正的諷刺，這其中不知包蘊着老百姓多少的血淚，國家多少的損失。自戰國以後，每一次的一統都要經過長期的內戰，付出無算的代價。一統以後的政府，爲要防止分裂，都必須有一套中央集權的專制辦法；這一套辦法的本質又必然要逐漸腐化中央政府及其人物，弄得民不聊生，於是又有野心家起

來取而代之，或者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但不論是中央集權或地方割據，其殘民自肥是一樣的，——如果是被外族征服，情形當然更慘。無論怎樣，在中國政治史上絲毫找不出民主的迹象是確定的。

西洋的民主政治起源於古希臘的城市文明。造成這種民主政治的最大可能性是城市小，人民容易參政。近代史上的民主政治都是容許各個地方單位有自治的權利，有自己的法律和自選的官吏，中央政府不過主持若干有全國性的大事，不可能也不敢想有專制性的統一。所以演變到現代的許多民主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最民主的國家，也都是聯邦或邦聯（Federation or Confederation）的形式。瑞士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也可說是最幸福的國家，因爲她躲開了最可怕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各州有自己的法律和州長，英國現在稱爲聯合王國，卽在三島範圍之內，愛爾蘭和蘇格蘭也是在半獨立狀態中，然亦無妨英國之統一。蘇俄合十六個國家而成蘇聯，十六個國家各有憲法，互派使節，但統一得比誰都堅固。卽使不談民主而單就統一而論，則在中國史上，裂土分戶的封建制度，也比廢封建改郡縣以厲行中央集權的嬴秦帝國國祚來得長久。

每一個統一時期的中國政府都愛採取中央集權，固然因爲權力本身是一種誘惑，但也由於在交通不便時代地方太大，不好控制的事實需要。但如果再追問爲什麼中央政府老想控制全國各地，則唯一的解釋是它既用暴力取得政權，別人自然會有『彼可取而代也』的思想，也用暴力來打倒它。管理衆人的事」者既然如此的威風而舒服，別人自然會有『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慨嘆。據說是櫛風沐雨，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周公，自然不容易使人想代替他。統治者如果是有才能的，他還可以用權威來奴役人民，但是兩傳三傳之後，又往往是些『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絕物」，野心家就想起來代替他，歷來的儒家最怕戰亂，沒有想到從根本上提高人民的政權，則在一方面用天道觀念來壓天子，在另一方面提倡忠君愛國思想來維持現政權，以免戰禍。這裏面當然也還牽涉到許多複雜的文化問題。中國民主思想之素無憑籍，上面的話可以說明一些原因。

世人往往把古希臘的黃金時代比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以說明彼時中國學術思想的發達，也有人歌頌秦始皇的統一中國是中國史上的光榮，到現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還在灌輸這類英雄崇拜的歆羨心理。是否想教我們的子弟也有當年項籍劉邦的抱負，我不知道。但是秦始皇的統一不是用齊桓公會盟的方式，而是用暴力來消滅六國，却替後世立下一個最壞的榜樣。楚人固然可以說：『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其實其餘的五國又何嘗是眞有罪而被滅的？秦用法家，本來很好，但是用血寫的法律，人民也會用血來洗去。在戰國的長期戰亂之後，統一的趨勢原已無可避免，然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大統一局面是用無情的暴力造成，造成以後又用極度專制的中央集權，把以後中國統治者的胃口弄壞了。結果是消滅了戰國時代的一切優點：諸子爭鳴的思想自由，成一家言的學術自由，處士橫議的言論自由，立談拜相的參政自由！僅僅保留下來戰國時代唯一的罪惡——內戰。自東漢至唐最講門第閥閱，『貴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平民只有納稅的義務，更無干政的機會。唐以後用科舉，雖有人稱道這個制度，以爲平民可以經考試而爲公卿，頗爲民主，殊不知第一，無論出將入相，依然是天子之臣。『臣，牽也』，許愼說得好，其原意是牽來的俘虜。這個「牽」字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的「牽」字並無區別。第二，這些將相公卿們，從田舍郎登了天子堂以後，立刻從一個階級轉入另一階級，不但可以無須納稅，而且可以向平民抽稅，如果有時候他們也納稅，依然有方法轉嫁到平民身上。英國是老牌的民主國家，他們的政治民主是由納稅人爭得來的，中國的納稅人則自古至今，尙沒有發言權。越是在鄉村中受徵實、徵借、攤派、徵工，徵役等剝削最重的老百姓，越沒有發言權。在戰亂中，則連活下去的生存權也沒有。假使生物學上「用進廢退」的原則可以用在政治上，則要使中國最大多數的納稅人有干政的興趣，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由此以窺今日所謂選舉的消息，明眼人當可以思過半矣。

要培養人民關心「管理衆人的事」，從關心而進於參與，自然只有從地方做起，逐漸擴大區域，以至參與中央的政權。現在嚷嚷的所謂地方自治，其本意殆亦如此。但若由中央規定一切步驟辦法，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則依然是在替中央辦公事，『上面交下來的，沒有法兒，』而不是替地方辦事情。中國的地方，譬如說「省」，本來就不是地域單位的名稱，而是中央的分支機構名稱。唐之「中書省」相當於行政院，而「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相當於「行政院（駐某地）辦事處」。假使省是人民自動集合的單位，如美國各州，由人民先已自動設立機構，則中國的民主政治一定較易推進。因此我曾設想，假使秦之統一，不滅諸侯而但爲盟主，則中國史上專制集權之腥穢淫毒，必不至如是其甚，禍延到今日的中國，還無法推進西洋在百餘年前早已有了的民主政治。秦政大一統這一事實，以今日的標準看來，爲功爲罪，大有問題。

中國今日還有一個隱憂，卽政府愛用中央統一的虛名，而不顧國土在實際上的削小。例如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政府總是有力則想控制，或羈縻，無力則任其自然，也聽憑鄰邦之覬覦而不問。我以爲這樣下去，內蒙、新疆、西

體都可能爲外蒙之續。要避免這種危險，只有實行中華聯邦的制度，而這種制度則與中央集權的體制背道而馳，最爲朝野人士所厭聞。如果在中華幅員之內，各種民族能採取平等的民主方式，結成一個聯邦，則外蒙可不至這樣不明不白的獨立，甚至將來可能加入到別的聯邦中去。局勢演變到今天，如再沒有勇氣正視現實，而欲以虛驕文其顢頇，以拖宕代替決策，則這個隱憂是永遠存在的。而推究問題的癥結，還是二千年來集權制度的觀念太深，不能推進民主政治有以致之。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最後答覆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的指教

樊　弘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我曾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政治主張發表了一點批評，附帶也論及了張東蓀先生的政治意見。在十六期上，張梁兩先生對我，均有一點解釋和指教。既然梁先生一再聲明，他的政治主張的全貌不久便要發表了；他在觀察上的零碎思想，還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意見，請我們先莫要加以批評，那麼，我便只好等待他的全部理論主張發表後再說。張先生說，他的根本主張與我相差不遠，既然相差不遠了，我實在也不用着多講。然則，我還有什麼話要說呢？我所要說的，只是張梁兩先生和我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的認識，在根本上，似乎尚有不同的地方。因此，我覺得，我如把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澈底表明一下，也許還可以減少我們彼此之間的不少的誤會。

我覺着任何有益於大衆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其所以不能實行，多半不是由於這種理想缺乏哲學的根據，而是由於他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耶蘇基督的博愛主義之所以不能實行，確是由於他與羅馬的貴族取得收益的方式——土地和奴隸相衝突，並不是由於他的主義不偉大。我們知道，耶蘇一生的使命都在以救主的資格來解放被壓迫的貧民及奴隸，攻擊那個壓迫同胞只圖私利的階級，並且常向富人發出警告，上帝一旦震怒，必定要把你們那些壓迫別人的人來處罰和治罪的。你能說他不偉大麼？偉大是够偉大了，無如他的主義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結果他便被犧牲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未能忠實實行，亦不是由於三民主義缺乏哲學根據，而是由於他的三民主義與大多數國民黨員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例如三民主義是要發展民族工業的，但政府的大員就有人在做洋貨寶，因此他便要不顧三民主義的指示，而極力爲美貨傾銷謀便利。三民主義是要實行廉潔政府的，但有許多人在作囤積居奇的勾當。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國民黨員就有不少的大地主。三民主義要實行民主政治，國民黨中便有不少人專擅獨攬大權。國民黨員與普通任何一個人一樣，他在行動的時候，絕不受他所相信的三民主義支配，而受他們自己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因此三民主義便爲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所毀壞。社會主義之不能執行，當然更是因爲他與資本家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資本相衝突的原故了。總括來說，就是任何有益於大衆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之所以不能實行，都是由於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而爲特權階級所反對的原故。

假令我的這種分析可以成立，那麼，我便覺得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在他的開宗明義的第一頁紙上，都須對於特權階級表示態度。假如說一個人的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極力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各階級聯合攏來，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覺得這種主義大有實現的餘地。我所謂的被壓迫的階級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特權的或壓迫的階級立於對立地位的一切的階級。假如說，一個人的主張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不去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階層，或不是主張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層，必須一齊聯合攏來，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敢說，他的政治主張，無論說的如何好聽，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權的階級的統治地位，其結果一定是不能實現的。這一種的政治主張，因爲他沒有實現的可能，我不能不說，他是空想的、虛僞的、和無效的。前一種政治主張，因爲它採相反的態度，並有實現的餘地，我却不能不說它是科學的、實際的、和有效的了。舉例來說，比如孫中山先生的排滿興漢的政治理論，他是主張被壓迫的漢族聯合攏來，推翻奴役漢族的滿清政府，而不讓一個滿人混入革命的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排滿興漢的政治理想便成

[illegible]的三民主義，雖然[illegible]精深博大，但他却沒有主張把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三民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人，如拉用軍餉的軍閥，新事帝國主義的新貴，便利外貨在中國市場上傾銷的買辦，攀上欺下貪污中飽的政客，流氓，豪紳，一致趕出革命的大本營之外，而把他當做革命的對象。相反地，三民主義的敵人均混入了三民主義的革命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便未成功。

梁漱溟先生的系統的或正面的政治理論，雖然我們尚未看見，但他的系統的政治理論的面影，我們已看見了。他的面影是什麼呢？是要由少數的高明深審的哲學家，來製出一個救國大計，並且這個救國大計，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可是對於這些高明深審的哲學家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則未一字提及。假如世上竟有一些哲學家，他們雖然在一方面，把哲學也學得極其精通，可是在他方面他們却也係特權階級的代言人，或極易與特權階級謀妥協，如像德國的黑格爾，極力擁護普魯士政府，尼采極力擁護超人，澳地利的全權主義社會哲學家史盤極力擁護納粹，和中國的康有爲極力擁護滿清政府。他們在哲學上均有極大的造詣。假令現在他們均一一現身於中國，而爲梁先生所賞識，叫他們來給中國製定一套救國大計，在製定之時，並只許他們極少數人討論，而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是不是就可救中國呢？假令不幸中國的救國大計，果由這一類高明深審的哲學家來製造並强制的付之實行，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迅速滅亡而已，尙何救國之有？我不是說，梁先生所指的哲學家就是這一類的哲學家。我的意思只是說，哲學家也可分爲兩個絕然不同的門類，其一是專以擁護特權階級的利益爲使命的哲學家，又其一是專以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爲使命的哲學家。假令不把這一點分辯淸楚，徒然提出一個空洞的高明深審的哲學家的口號，我所最就心的，就是恐怕不幸中國落入在這些代表納粹思想的哲學家的魔掌下，而把中國淪爲德國第二，或把中國永遠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而永不得翻身。漱溟先生！我眞是害怕得很啊！不知先生亦會看出這點危險否？我看太危險了！太危險了！太危險了！

梁先生在他答覆我的短文內，曾以師長的口氣，婉勸我說，「我只勸樊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以好學深思領導靑年，則於大學教育爲幸多矣！」我願答謝梁先生的，即我深願努力做到以好學深思領導靑年這一點。但我同時却也要向靑年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我在世紀評論一卷二十二期上曾指出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不中用，和在去年三月一日的天津大公報上曾指出儒家哲學的不中用，在知識與生活的第十六期上曾指出張君勱的憲政主張的不中用。我覺着，我旣然在中國這個角落上，負有小小的文化的使命，而且又是一個學經濟學的人，除了教課之外，假如我對一切時下的思想都一概靜默無言，而不從經濟的觀點，去發表我的無畏的批評，我覺着我便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我相信眞理愈辯而愈明，所以，我要繼續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的批評。

張東蓀先生在他政治理論裏面，不知是否肯承認政治含有階級性，假如說他不承認這一點，我看我的批評，至少，還有一半的價值存在。假如說，他承認這一點，那麼，我的批評便將全部失掉了它的存在的意義。我以爲世上也沒有什麼從天而降的眞美善均具備了的政治主張，除非他所喊出的是代表被壓迫的人民的聲音。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北京大學

論不滿現狀

朱自清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裏，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嘆，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爲什麼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敎，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爲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爲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强，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着；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旣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躲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

，讀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眞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爲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着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着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那兒發洩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羣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纔能發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爲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閒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弔着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爲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裏面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着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我們的歷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只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面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復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弑，軍閥靠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爲中心，自己爲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裏。從前雖然也常說「衆擎易舉」，「衆怒難犯」，也常說「愛衆」，「得衆」，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兆衆賴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衆」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羣衆」，「公衆」，「民衆」，「大衆」，這個「衆」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裏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揚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揚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面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爲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聞理亂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經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着」的「士」，而知識分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無法「養」着這麼大量的「士」。他們只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着自己。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羣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後改變成什麼樣子？這眞是個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勢，我們得提高警覺來應付的。

（上接十二頁）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這是一個，不講原則，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賣朋友，沽名釣譽，陰結私黨，維持高位的型式，一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常見的官僚面目。

從公孫弘所開創的官僚路線上，孔子所維持的道統，已不復成爲王天下的規範而成了歌功頌德支持皇統的飾詞了。韓愈雖則自以爲是開八代之衰，直承道統的人物，而他的道統卻完全變了質了。在他的「諍臣論」中簡直把諍諫的意義訓作了爲皇帝獵取美譽的手段了。他說：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至吾君于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韓愈已不再問皇權是否合於道，這已不是他的問題。皇統既然即是道統，帝皇就有責任起用這些士人；士人也有責任自爲於朝廷。兩者也應合而爲一。他的理由是這樣：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贄，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他甚至責備四十餘日不覆他自薦信的宰相說：

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從韓愈自承的道統起，中國之士，已經不再論是非，祗依皇統來說話了。所謂師儒也成了鄉間諂諛聖驗的人物了。

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於清華勝因院

「柴那門的機會」

——美國人眼中的華僑

史超禮

美國有一種約略相當于我國「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專門描寫早期美國開闢西部荒野時代，牧牛漢子(Cowboy)鋤強扶弱的故事。(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二人都愛讀這一類小說，據說他們一晚都可讀兩三本。)書中常描寫到惡霸，匪棍無法逃出英雄們的掌握時，只簡單的說一句：

『啊，那些匪棍們只有「柴那門」(註一)的機會。(Chinaman's Chance)那等於說：

『啊，那些匪棍們絕沒有機會。』

一九四六年紐約的中國人間曾流傳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代表，住在華道夫大飯店(註二)。一天在房間附近遇到另一位貴夫人的[illegible]客，拿了一包衣服要他去洗。這位代表解釋說，他不是洗衣的。這位貴夫人大爲驚訝道：

『你這個中國人竟不是個洗衣的！(You, the Chinese, are not a Laundryman!)』

一位在工廠實習的朋友，曾告訴過我另外一個故事：一次他去一位相處年餘的美國朋友家吃飯。飽餐之餘，那位先生(一位很有經驗的工程師)，很誠懇地問道：

『若是你不見外的話，我想有件事請你幫忙？』

『當然沒有問題。』那位朋友慨然應允。

『我想請你把燒「雜碎」(Chop Suey，中國菜的通稱)的方法，教給內人，使得我們有機會在家裏也可嘗到你們中國菜的美味。』

這是一般美國人眼中華僑簡單的寫照。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却得承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華僑(中國人)似乎只有兩種。一種是開獨間門面洗衣店，掛着「手工洗衣」(Hand Laundry)招牌的洗衣工人。另一種是開飯館，用年紅燈拚成「雜碎」廣告來招徠顧客的廚師。

華僑在美國社會中所能得到的，除了洗衣和開飯館外，只有「柴那門」的機會。

當然事實上也有例外。有的幸運的，或能力超乎常人以上的，可能打入醫生、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或其他專門性職業的領域。像美國電影界幾位華僑演員，一位著名的電影攝影師 Howe Wong 、一位出色的卡通畫家 Paul Fang 、和一位名滿西岸的女外科醫生 Dr. Margaret J. Chang。然而絕大多數却靠着洗衣和開飯店過活。除了這兩項「標準化」的職業外，還有一小部份在市郊開小農場，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雜碎餐館。另外一小部份開乾貨店或玩意店，出售中國特有的小玩意，來美國人的好奇心賺點錢。

因爲華僑在一般美國人的眼中已經典型化了，使得他們相信華僑對別的職業沒有興趣，沒有野心，只死守在洗衣和開雜碎館兩個範圍內。有的美國人甚至歸告于華僑的宗教(？)。一位名叫勃魯爾的神父(The Reverend Dr. David James Burrell)曾說過：

『這些「柴那門」的宗教(孔夫子教，(Confucianism 多半美國人認爲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宗教。)使得他們變成今天這樣一種洗衣匠和苦力的種族；愚蠢，鈍拙，忽視上帝，像生活在洞穴裏，終年不見陽光的土撥鼠。』好像太平洋彼岸四萬萬中國人全部是洗衣匠和苦力似的。

難道華僑眞的對別的職業沒有興趣和野心麼？當然不！華僑之所以有今天，因爲除了飯館和洗衣店兩條路外，只有『柴那門』的機會。別的職業很難插入足。有的行業根本不歡迎華僑，有的職工會不准華僑參加。走來走去最後還是走上這條老路。例如一位在紐約黑人區(Harlem)開洗衣店的華僑陳明，在美國生長，中國本土的情形很少知道。受的是徹頭徹尾的美國教育，除得了一家有名大學——當然是美國大學。——的學士學位外，還在匹茲堡(Pittsburgh，美國鋼鐵業中心)念了兩年研究院。然而因爲要找一個如他所學的本行的事，到處碰壁，最後還是開了一家洗衣舖了事。另外一位土生華僑幼年曾給家裏送回國內受教育，長大回到美國進大學，連得到兩個學位。所遭遇到的命運，同樣是學非所用的故事。所不同的，這次這位華僑學士沒開洗衣舖，而是做了他父親雜貨店裏的伙計。

在戰時，因美國一方面人力缺乏，同時中國畢竟是盟國，這種種族成見和經濟上的歧視要好一點。學工程的華僑多半能找到工程師的職位。工廠裏的熟練和半熟練技工的位置也容許華僑參加。停戰之後，一切又恢復到「常態」。紐約附近一家工廠，一停戰就把實驗室裏面一位惟一的中國工程師(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裁掉。華僑技工也由幾十人裁到只剩一兩人。一廠如此。餘可概見。

華僑在目前雖然在美國人的眼中只剩下兩大類。然而百年前，華僑初移殖到美國時却不如此。那時的華僑 要地是礦伕，鐵路苦力。和莊稼秋收時的短工。開飯館和洗衣舖的很少。一八四八年美國西部的採金熱潮(Golden Rush 卓別靈電影「掏金記」可給你一個大概的印象。)是華僑移殖美國的開端。一八四八年之前 ，全美國的華僑不過五十人。一八五〇年之後却增加到 25,000 人。僅一八五一年內就約有 10,000 名華僑到達加尼福利亞州(California)。其後金礦的熱潮逐漸消沉，鐵路業一天天發達。鐵路業極需廉價勞工。於是華僑又轉而爲鐵路苦力。這需要一直延續。大批華僑便由香港、廣州、汕、澳門、上海一帶當「豬仔」給運來美國。當時每頭「豬仔」約值 400 到 1,000 元美金。換句話說，花上 400 到 1,000 元就可買一個終生工作的奴隸。這和由非洲向美國運售黑奴的情形正相彷彿。跟着鐵路的發展，華僑人口逐年增加。到一八六八年時總數竟達90,000人之多，(華僑現在的人數，據美國戶口統計是 77,000 人。實際不止此數)。這 90,000 人口差不多全部集中在沿太平洋海岸幾州。其中尤以加州爲多，約 75,000 左右，佔全州總人口的百分之九。當時這些華僑苦力們的苦力幾全部用在修建鐵路上。一八六九年(離現在整整七十八年)第一條橫貫全美，溝通兩洋的鐵路在猶塔州(Utah)境內最後一合龍一時，西半段(「中央太平洋」(Central Pacific Railroad)鐵路幾百分之九十是華工穿山越嶺，經過不

毛的沙漠築成的。東半段「聯合太平洋」鐵路綫(Union Pacific Railroad)則係以愛爾蘭人為主的勞工築成的)。有一個傳說說：「中央太平洋」鐵路綫的每塊枕木下有一付華僑苦力的骨頭。至今，在加利福尼亞州鐵路沿綫一些峻岩削壁上還可找到當年華僑苦力一鋤鋤闢出來的痕跡。

除了在鐵路上做工以外，那時華僑還在白人放棄了的礦上做工，或在莊稼上做臨時的短工。所有這些都是最下級，最沒有油水可沾，最賣力慣命的工作。簡言之，美國初期開發西部荒野時代所最依賴的賤價勞力(Cheap Labor)差不多全部是華僑供給的。

雖然這樣，到十九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等鐵路幹綫築成，礦也開的差不多，勞力的需要漸達飽和時，局面便改觀了。在起先，白人雖然討厭和輕視華僑，但因修鐵路，開礦山等事業都還很發達，工作的機會還很多，彼此間大致還能相安無事。之後，工作的機會減少，白人認為華僑搶了他們的飯碗，便開始發動了排擠華僑運動。他們大讚華僑都是些「豬仔」，生活標準太低，和他們在勞力市場上競爭太不公平。實際上據一位著作家說(白人)，這些華僑苦力們從來就沒有和白人「競爭」過。華僑所做的差不多全是白人不願做的最下等工作，所開的礦全是白人礦工認為無利可圖放棄了的礦。然而排擠仍然是排擠。加尼福利亞州的立法上一條又一條地通過排擠和歧視華僑的法律。(華僑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後來覺為這個還不滿意，接着便採取直接行動。直接行動最主要地包括「燒」和「殺」。舊金山街上白人聚毆華僑，強剪辮子(當時華僑還穿著清朝的服飾，男子留辮)。是常事。稍嚴重的便遭到燒房子搶財產的災難，甚至丟掉性命。後來演變愈烈。一八八五年懷義民州(Wyoming)的一個名叫岩泉(Rock Springs)的礦工小鎮上，一次暴動就屠殺了廿八個華僑，害傷了十五，造成美國空前一次大規模的慘案。就數目上說，廿八人不算多，和白人殺傷紅印第安土人(Indian)的數目相比差的太遠，然而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是「戰爭」彼此有武器(雖然是弓箭對槍炮)彼此有死傷。白人殺華僑是屠殺，華僑根本無武器，無抵抗。

地方性的立法(州立法)或直接行動只能限制或對付已經來到美國的華僑，還不能阻止源源不絕將要由中國移殖過來的華僑。所以沿太平洋岸幾州的政客和國會議員拚命鼓動全國反華潮，終於在一八八二年使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華人移民律」(Chinese Exclusion Act.)從根本上斷絕了華僑的來源。自從一八八二年以後，除了學生，外交官員，官吏，等消費者可暫准入美外，美國政府不准一個中國移民進口。中國的移民也無法取得美國籍。(除了在美國生的自然成為美國人)和歐洲來美的移民相比，其待遇簡直是天壤之別。這情形一直延長了六十一年，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好轉的現象。因為戰時盟國。以及羅斯福總統的努力，美國國會於一九四三年修改了移民法，取消了一八八二年的「禁止華人移民律」准許中國每年可有105名移民，和歐洲(白人)移民同等待遇，在規定的時間內，可成為美國公民。就數量說，105名的數額，實嫌太少，而且已經在美的華僑，多半是第二代第三代，照美國法律已經是美國公民，新律對他們就此點說並沒有多大用。然比六十一年前的那條老法律總高明進步的多。

當白人發動排擠華僑運動時，華僑為了避免犧牲，避免和白人「競爭」，便逐漸地由鐵路，礦山，農莊退了出來，退到自己那個小角落裏去，幹些白人不會做，(如中國的「雜碎」)或不願做(如手工洗衣)的事情。這便是今日「中國城」(China Town華僑自稱「唐人街」或華埠」。國內來的人多稱之為「中國城」。)「雜碎餐館」和洗衣舖」三位一體的來源。

難道華僑真如美國人所想的，天生就是洗衣做菜的能手，不會做別的事麼？看看那些鐵路，礦山，農莊，須知答案是否定的。華僑不是不願做別的事，也不是不會做別的事，只是沒有辦法，為勢所迫，才走上今天這條路。因為他們所有的只是「柴那門」的機會。

其實開飯館和洗衣舖在美國也不是什麼太卑賤的職業。白人幹這行當的有的是。問題在：中國人幹就覺得似乎到處有點彆扭似的。

在美國，華僑最感到困難的是「住」。因為種族成見，和生活習慣的關係，華僑多半不願，也很難和白人混住在一起。(除非在小城市華僑太少)，較大的城市，華僑較多自然就形成一個特區——「中國城」。而到處「中國城」的房屋都是擁擠狹小不堪。照我們國內住宅標準看，已經比上海南市的貧民窟好得多，然就美國一般的標準都差得遠。華僑是在美國生活，當然得依美國的標準。例如最大也是最老的舊金山「中國城」，據美國市政當局說便是「全美最擠」的區城之一。此次世界大戰前，舊金山「中國城」二十條街巷見方之內住了 15,000 名人口。其中五分之三的華僑家庭只有「單間」或「雙間」的屋子可住，而四分之三的屋子又不合標準。經改善，才變得好得多。舊金山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國城」也不見高明，尤以紐約的「中國城」為劣，街道之狹，人口之密，恐怕要算首屈一指。

「中國城」的房子不但擁擠，而且設備簡陋，因此衛生的環境差，疾病率高。舊金山「中國城」的肺病率，據該城市政府衛生局統計，為全城的三倍。多數的屋子沒有浴室和暖氣設備，還在美國城市裏是相當稀有的現象。紐約的「中國城」有專設的澡堂，名曰「沖涼房」附設在理髮店裏，這種特別的「澡堂」設備在美國城市，其他區域裏很難找到。

這種現象，當然使華僑想起要向外發展。可是兜頭就碰上兩大問題。第一是經濟的。向外搬，脫離了「中國城」的經濟體系，不易找到生活的立腳點，若在「中國城」自身謀改良經費又特別困難，同時地產房產又多半不是華僑自己的。第二是社會的。離開「中國城」找個房子住，雖然不見得不可能，然而費點手脚是必然的事。因為有些地方根本不願或不許中國人去住。

此類情形，美國西部沿太平洋岸幾州尤其來得顯著，這也許是由於歷史的傳統關係。例如戰時一位華僑航空工程師帶了家眷在加州南部聖地牙哥城(Sun Diago)住宅區買了座房子，正要搬入，却遭鄰居白人們的羣起反對，說他們那兒那樣清潔幽靜的地方不願讓一個中國人(其實那位華僑也是美國公民)插入。因爭執而鬧到法庭，結果還是那位中國人贏訴。因加州有法律禁止賣房產給華人。(有的州不如此、

在美國，一個中國人無論是剛自中國來的或是土生的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在報上看到廣告打電話約看房子最好先說明你是中國人，假若對方願意你去看，才去。免得臨時發生變化討沒趣。有的人不願租屋給中國人，會客氣地婉言拒絕，有的不客氣的則老實告訴你他不願租給中國人。美國人一向號稱最愛「自由」，他有不願租屋子給你的「自由」，你也沒法。

因為種族的和經濟的原因，華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一般都很低。就地區講，西部沿太平洋岸幾州對華僑最苛，東部沿大西洋幾州和新英倫區(New England)稍好，最好的要算中西部(Mid West)一帶。屋子難找，也是一種現象。更困難的是社交和婚配問題。華僑中女性特少

當困難，二、向國內設法討中國妻子，可是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通過實施的移民律禁止華籍妻子進口（註三）三、討國內來美留學的中國女子。這點因國內來美的女子多半社會地位較高，不易高攀得上，也很困難。這幾條路走不通，只有討白種女子，這點更困難。首先白種女子很少眞心願嫁華僑，除非你特殊有地位或有錢。有的嫁給中國人的也多半來自較貧寒的家庭，不是純粹為了思想和學術的共鳴或是眞正的愛情，而是另有別的原因。因此這種婚姻的持久性頗有問題。一九三六年左右，故林森主席螟蛉子和一位五分商店店員結婚後又離婚的故事便是一例。這種情形由「幸福」雜誌（Fortune Magazine）所舉辦的一次測驗看得更清楚。那次測驗的結果，指出美國人在選擇室友或配偶時，最不受歡迎的除黑人和猶太人而外就是

述，娶白種女子既多困難，自己黃種女子又太少，於是有的華僑（多半是中年或近老年的洗衣作老闆）便娶黑人女子為妻。這一方面解決了家室問題，同時在經濟上又有不少幫助，因黑女多半可以在洗衣工作上幫忙。這種情形並不多。然而已引起其他華僑普遍的責難。他們的爭點是：這樣一來把中國人的地位降得更低，降到和黑人一樣。一些由國內來的「高級」華人更引以為恥，提到便搖頭太息。在他們的看法是：這樣多開洗衣舖和飯館的華僑已經夠「丟」中國人的臉了，再加上娶黑人為妻，變得和黑人一樣，眞要陷到萬劫不復的地位了。

然而在一般美國人看來，所有的華人都是一樣。無論來自中國的貴賓或土生土長的老華僑，他們都一律同等看待。在他們眼中。華人總是華人。而華人不是白人。

略微有些美國人用[illegible]說這個字。然而 Chinaman 則簡單地告訴你：中國人不是單純的中國人，而是些比白種人天生差一等的神祕的怪物。

（註二）華道夫大飯店（Hotel woldorf-Astoria）是紐約最華貴的旅館。各國達官要人，王公貴戚來紐約多半下榻於此。最便宜的房間二十美金一天。孔祥熙氏全家是華道夫的老顧客。

（註三）華籍美兵本來也受此律限制，不許他們把在中國戰區作戰時討的華籍妻子帶到美國。（雖然白人美兵可以。甚至可討德國和日本女子為妻，帶來美國）。後經華籍美兵退伍軍人會力爭，始獲特許。

論師儒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四

費孝通

我在「論紳士」一文（觀察三卷二期）中曾說：「這種仍被稱為士大夫的人物，自從封建解體之後，一直沒有握過政權。」我所謂政權並不指做官，而是國家的主權。在封建時代，主權屬於貴族；在朕即國家的皇權時代，主權屬於帝皇。中國歷史上不但沒有過士大夫階層共同握有主權的時期，甚至可以說，以士大夫個人身份占有皇權的事例也是罕見的。這被視為篡逆的行為，不但不受士大夫階層的支持，而且是認為不應當的。士大夫階層從沒有過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運動。在政治史上，他們是消極的，不是一個爭鬥的力量。這個階層在經濟結構中是中國農業社會裏的特權階層（關於這一點留在以後續論），在地方社區生活中是社會威權（見論知識階級），可是在政治上他們卻並不和帝皇爭取政權，在中國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有如英國大憲章一類的事情，怎麼會這樣的呢？儒家思想裏的道統觀念，在我看來是形成這事實的一個因素。維持道統的是師儒。本文就想分析師儒這種人物和皇權的關係。師儒這種人物的創始者，也是模型，是孔子。所以我們不妨從孔子說起。

一個過渡人物的象徵

孔子在血統上是一個謎。這個謎並不是偶然的，正象徵了士大夫社會地位的謎。從社會史演變中的重心說，從部落的文化英雄燧神，神農，嫘祖，傳到部落的政治領袖五帝，再傳而到封建的帝國——這個系統：堯，舜，禹，湯，文，武，都是在朝的，而且是帝皇。到周公，發生了一點變化，就是在封建宗法上並沒有做皇帝資格的王叔卻執了政權。這固然並不是說從周公確立了貴族主權的政治，但是在系統的傳襲上卻發生了新的意義，重心開始離開了帝皇，轉入其他人物的手上。孔子的潛意識裏念念不忘的是這象徵着歷史中心轉移的周公。可是周公祇表示了皇統和道統的分離，所分離的也極幾微，祇是個開始，到孔子才把這趨勢實現。在這轉移中，富於象徵作用的「萬世師表」應當是怎樣一種人物呢？孔子出生之謎：在這裏有了意義。

正史說孔子是貴族之後。在封建體系中，他是微不足道的，和周公比相差太遠了。在道統依附在皇統的時代，孔子是無法從血統的身份上得到這「統治」的，於是傳說發生了，這傳說得為孔王找一個離開封建系統的來源。史記上對於孔子的身世就露出可疑之處。先說是「野合」，再說是他母親不把父親的墓地告訴他。後來他母親死了，別人向他說了，才合葬。孔子的出身據說當時也很有人懷疑：「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這是說孔子自認是貴族之後，可是，「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這是說不承認他。

如果要孔子接周公傳道統，一方面要表示他血統裏有貴族的素質，可是又要他把道統和皇統分離，另一方得表示他另有來源：史記上說是「禱於尼丘得孔子」——這是神授；外史稱履大人跡，更把這神授的意思提得清楚一些。

孔子自知是一個轉變中的人物，一個封建和非封建之間的接頭。下面一段話形容得酷肖：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

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這是一幅人首獅身的圖畫。帝皇，貴族，大臣，平民的雜揉物——一個過渡人物的象徵。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衛道者

皇統和道統的分別是儒家政治理論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和西洋中古時代的政治和宗教的分權有相似之處，但也不完全相同。在理論上，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他也是指權力的雙重系統。有一次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責問耶穌，「你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耶穌回問他們：「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這些人不肯回答。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這裏說明了在耶穌的眼睛裏作事的權柄有兩：一種是從天上來的，一種從人間來的。兩者可以並行。但是歐洲中古的歷史裏人間的權力却降服在天上的權力之下。降服在宗教之下的皇權。政教分離的結果是民權的抬頭。在西洋政治意識中，權力不從天上來就得從人間來，人間即是民間；在他們似乎不易有「天縱神明」的自足的皇權。

在中國，孔子也承認權力的雙重系統，但是在他看來，這兩個系統並不在一個層次裏，並不是對立的，也不必從屬的，而是並行的，相輔的，但不相代替的。該撒的一個系統，就是皇統，是相同的，而另一系統在西洋是宗教，或是教統；在中國却並不是宗教，是道統。有人把儒家看成宗教，或是無神之教，因為他自成一個系統，不過這系統和教統有性質上的區別，區別也不祗是理論裏有沒有個神，而且在和人類行為的關係上。耶穌的確用一種「權柄」，作一些「事」，因之在大家要做事的領域裏，上帝和該撒最後還是會衝突的。衝突的結果是有一個克服另一個。在我們，道統是一個「理」，一個應當這樣做的規範，一個依着這樣做就能王天下的路子，並不是「事」，因為按不按理做和有沒有理是分得開的。事歸皇統，而理則歸道統。這一點孔子說得很清楚：

孔子曰：『同，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這裏說明事實上在「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的亂世，道還是可以「既已大脩」的，那是說事與道是兩回事，道是可以離事而脩的。道脩之後，用道於事，並不是「不在其位」的人的責任，而是「有國者」的責任。「有國者」可以用道，也可以不用道；「不在其位」的維持道統者可以設法「推而行之」，以見「容」於有國者，但是却不能直接行於事。所以「推而行之」祗在取得有國者的「用之」的一層裏，而並不進入「仗着權柄，作這些事」的一層裏。皇統和道統，一是主動，一是被動；所以站在被動的地位才會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是有權的，行藏是無權的。

在持執規範的人看去，實際的政治有些和有時是合於規範的，有些和有時是不合於規範的，於是分出「邦有道」和「邦無道」。堯舜是有道的例子，桀紂是無道的例子。皇權可以失道，當失道之時，衛道的人並沒有意思去改正它，祗要勤於自脩，使這規範不湮滅。依孔子的看法，明白規範的人可以在被用的時候把道拿出來，不被用的時候好好的把道藏好。師儒就是和這道統不相離的人物。皇權和道接近時，師儒出而仕，皇權和道分離時，師儒退而守。所以他一再說：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道統消極的等待機會

關鍵是在皇統和道統怎樣接得通。師儒的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說就是皇統加道統。怎麼去實現這理想呢？這裏埋着孔子的矛盾。他是封建的後裔，他注意社會秩序，一個定於一尊，按着禮治的秩序，靜態的社會。封建的傳統使他想不到皇統可以脫離血統；靜態的理想使他厭懸改變社會結構的革命，這是這過渡人物的上半身。因之他對於皇統是看成既成和不變的因素。可是同時他又以道統自負，死守那個王天下的理，也是不能變的。關於這一層子貢曾勸過孔子，而孔子很固執。

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

這樣說來，這兩個不變的因素怎能碰頭呢？於是要碰機會了。一方面要有耐性的等待，一方面要不辭勞苦的遊說。他等待的心情在和子貢的談話中說得很露骨：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孔子的周遊列國，據史記，他曾「干七十餘君」。「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他那種不肯錯失機會的心情在下列一段史記的記載中更可見到：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當孔子得到了有人用他的時候，他是想做事的：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但是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別人眼中却是：「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所以儘管有耐性，儘管到處碰機會，與聞政事的機會還是不多。即使碰着了，如果不把皇統風服，還是沒有把握使王道能繼續下去的。孔子自己還是「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的離開了魯國。他感慨得想「乘桴浮於海。」但是如果他真的「三年有成」，怎樣呢？他在竇鳴犢，舜華之死看到了所謂學而仕的師儒人物的結局了：

「孔子」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丘乎？

[illegible]

他和以後的士大夫一般認為「道理」可以存在於「眞際」，不必一定要出現於「實際」。讓我再引一段史記來點出這種儒家的基本的看法：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我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春秋是一部政治典範，但存在於眞際，不必存在於實際的。所謂道統和皇統也就平行着。孔子的尊號是「素王」。這個沒有位的「王」是中國政治概念中的特色。這也是我所謂士大夫沒有握過政權的意思。素王的後裔是師儒。

奉天以約制皇權企圖的流產

道統如果永遠不能控制皇統，儘管在道統的立場罵這些失道的有國者不知恥，皇統自己並不覺得如此。邦無道時，師儒們固然不妨把道卷而懷之，可是其如蒼生乎？師儒們儒可以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是同樣可能的是：「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這是說師儒們並不是月亮上的人物：世界上好，下，次凡；世界不好，拂然上天。皇權的統治是「率土之濱，莫非國土。」道統可以自求不辱的合則留，不合則去。皇統卻「有着權柄做這些事」，他可以燒書坑儒，可以興文字獄，可以干涉道統。孔子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祇要是在一個世界上，道統和皇統在實際上是無法各行其是的。道統不爭皇統，皇統卻可壓迫甚至消滅道統。如果情形是這樣，師儒們怎麼辦呢？積極的出路是走上西洋的方向，制約皇權，把皇統壓在道統之下。但這和封建裏所養成的傳統不合。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並沒有採取過。所採取的卻是另一套。

孔子呼天，這個天是空洞的，即使有知也是不干涉人事的。可是在到了道統被壓迫得沒有翻身的時候，這個天卻被請出來干涉人事了。孔子的道統是沒有權柄的，不作什麼事的 作事的祇有皇統。但到了董仲舒手裏，道統却道接觸了一個干涉人事的天了。孔子的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之也有了這基本的差別。董仲舒對於皇權觀：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傷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在董仲舒的公式裏上是天，中是皇，次是儒，末是民。他抬出天來壓到皇權，使皇權得有所畏。誰知道天意的呢？那是師儒。他特別主重師道，師道必須歸於一統，然後才能代表天意。這一點和從民意去看天意的民主萌芽是不同的，雖則大家都保留着聽不聽天意的權柄給皇權。依着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之際的符兆主義，師儒不過是對着皇權去壓天。天要降刑罰時，並不用民，而用自然的災異，先是警告，然後是打擊。在這套理論中，雖則對皇權增加了一項壓力，但是利用這壓力的並非師儒，更非人民。

如果董仲舒再走一步，也許可以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就是由師儒來當天的代表，成為牧師，或主教。師儒再加組織，形成一個教會，獲得應歸於上帝的歸之於教會的權柄，發展下去，可以成為西方的政教關係。但是這並沒有發生在中國歷史上。董仲舒的災異說發展到不利於皇權時，先就受到壓迫。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高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災異論雖則沒有做到控制皇權之功，但是給民間一個重大的刺激，因為這種理論把皇權的絕對性給打擊了。如果「天厭之」時，皇權就得改統。於是在漢之後，每一次皇權的動搖，農民的暴動都得借符瑞來取信於民。這也表示了這種理論被民間所接受的情形。災異論成了改統的根據，但沒有改變皇權的性質。

道統被出賣

和董仲舒同時的，徙董仲舒到膠西去的陰謀家，公孫弘，也是學春秋的儒者。但是他卻另開出一條納師儒入官僚的道路。在當時正統的儒林看來是出賣了孔子衞道的傳統，不肯還就皇權的九十老人轅固生，罷歸的時候，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師儒有着維持道統的責任，不能投機。但是以曾做過獄吏，又牧過豕的卒伍身分致顯朝廷，封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孫弘卻並不這樣看。他看到的是出賣道統，依附皇統的投機利益。其實這早就註定的命運：孔子的矛盾，祇有兩個可能的解決，一是道統制服皇統，一是皇統制服道統。轅固生，董仲舒不肯甘服，被放逐了；公孫弘甘服了，做到宰相。

公孫弘所主張的是由皇權來利用師儒去統治人民。他說：

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

公孫弘的「做官」「事上」也開了官僚的風氣。漢書裏描寫得很逼真：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

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

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下接七頁）

觀察通信版

乾坤一擲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政府當局在今天，實在遭遇到空前無比的嚴重形勢。在黨政各方面負責的人，都不否認當前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各種危機。儘管行政院張院長依然維持他一貫的戲劇性底政治姿態，擎着官話當眞話說；可是在南京政治圈子裏混的人，接觸到當局最近一些緊急措施，和目擊各機關的風氣形態，誰都會意味着這是抗戰以來最難過的一年。

當局諸公的表現，可以煩燥與苦悶四字盡之。上面的手令皇皇急如星火，奉行的大官們爭辯、推諉，互相歸過吵到「以命令變更法律」，連面子都顧不住。關於戡亂的政治經濟的辦法，天天研討，各是其是，你來一套，我來一套，都經過批准而試行。舉例言之，傅作義以在綏察的特殊地位，與他的一點幹的精神，僅僅收效一時，傾立刻變為政治上的紅人；連陳辭修都為之遜色。傅在綏遠利用軍權，統一黨政民的一套辦法，被一位黨工人員給闡揚出來，於是訂立辦法，通令倣行。其實傅的成功，根本不是由于辦法的本身，而是由於人事的條件。又如棉紗代紡代織的辦法，原是戰時花紗布局已失敗的辦法，並且為着那些辦法不合理，窒息了中小工廠喂肥了官僚資本的廠家，和經手機關，才鬧到主管人撤職，花紗布局撤銷。這在棉紗缺少的地區，已經行不通，現在拿到上海來，如何搞得好？并且根本違反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憲法上面企業自由的精神。但是終於拿出來了，誰又肯來翻舊案呢？再次如這次選舉法規，關於候選人，本是規定以公民簽署提名為主，政黨提名為輔。由於國民黨內的一番「競選」運動，使得民青兩黨眼紅，硬要「保障當選」；主持黨務的人們，卽藉之為打擊異已的工具，所謂「地雷」者，本是臨時栽的，如果那一處國民黨候選人非有關係者，可能的便拿出「地雷」來，黨員如何心服？這些不服氣的黨員祗好抱着選舉法規，進行簽署，黨中央這時纔着急了！幾次和選舉總所商量，辦事的人，當然不敢違法，這才通出國務會議變更提名方式的決議案來。緊接着又是不經立法院決議而以命令實施的郵電加價，這些：：都可以看出政治上是如何的焦燥來了！反之，不在權位，或事權並未全屬的人們，目覩着兩黨囂張，「武治」發揚，和政府內部的傾軋矛盾的現象，便只有苦悶的一途！以身負黨局的某某，還慨嘆着說：「我們的政治，眞變成少數人的政治了！只有兵和××，才是政權的支持者！」另一位少壯中委，大喊着「政治不能改革，只有坐待××黨來，一切都通了」！這些牢騷，一半是推卸負之責，一面亦何嘗非眞正的苦悶！

在這煩燥與苦悶的當中，當局居然想出幾條「求活」的路子：

第一、要建立地方政治據點，決心以政治和敵人競賽。辦法是：調黨團的編餘人員，和招收一部份人員，設置訓練機關，大規模施以訓練。一面在收復地區如大別山、魯中、鄂東、等地，劃出一個特別行政區，編練武力，組織民衆，相當的辦經濟事業，解決點土地問題。一面等訓練結束，派遣他們到那些地方去工作，主持的人，可能是少壯、忠誠、而為當局所最親信的人。報端傳出陳澤任老河口綏靖司令之說、便是這個來源。

第二、劃地分防，以民衆力量，代替國軍。這是白崇禧氏所最主張的。當然他最憧憬於手創的廣西民團制度的「三自精神」，這次民衆自衛隊組訓的一套辦法，多是此公手訂。六省主席會議之後，紛紛回去招兵買馬，籌款加捐，大有不惜政令、紀綱、民力的代價，來加强地方大吏權力，使他們能效忠中央，打擊敵人。此一政策的影響，引起「建警」與「建國」的磨擦，本來已經成立的省警保處，紛紛撤銷，保安團依舊是省主席的親兵，今後警察方面的動向，只有走向管制查察的一途。

第三是金融管理機構。外傳這是上海方面所擬的「經濟戡亂」方案的結果，其實並不盡然。原來金融管制是件很複雜而繁重的工作。在孔庸之當國時，財政部與中央銀行，本不分家。那時中央銀行，對行莊管理，並不熱心。此類工作，外有銀行監理官，內有錢幣司，大半是財部辦理，餘外便是四聯總處，也常過問。到TV宋登台，財部與之為「別子」央行卻是嫡系，這類金融管制的工作，多在央行。同時經濟的決策，又多出於其智囊團之手。TV宋倒了，央行與財部分在兩個派系的主持之下，央行方面加上行政院的支持，仍是不斷負責，而財部的錢幣司，也不肯後人。幾個商業銀行的撤銷，頗露鋒芒。但對金融市場的眞際，如證券、金鈔之類，甚少觸及。反之，經濟檢察的觸鬚，已經伸進來了。軍方的檢查，挾着無上的威權，與對金融資本家們的反感，橫抑進來，財主們，是吃不消的，在這裏央行與財部立場，毋寧是一致，願意以正常的職掌，與成文的法令，負責管理；又可擋住軍方檢查的鐵腕，一面也可對本集團以上的遊資與既得階級，加一道管束。有人計算，在抗戰期間，川滇兩地的豪富資產，幾乎發達到寧波，廣東資本的水準。自抗戰結束到現在，由於形勢的推移，和下江商幫的手法靈活，再加上官僚資本的參加，內地幫已削弱到不堪之境。連帶着、漢口、西安兩市場、也大大的衰微下去了。

以上幾點，加上其他零星措施，總結起來是更深刻地管制人民，榨取軍事費用，在「自力更生」中求出路。當然，當局的估計，是三月後的外援——這是王雲五自美歸來的樂觀條件，必然來到，藉着對方在嚴冬的軍事休眠，來加强本身的力量。事實會不會這樣有利的發展呢？那便要看執政黨內部是否肯團結應變？——明年三月如期召國大。政府公教人員與軍隊，能不能束緊肚皮工作？最有力的還要仗着有眞心的商人，手裏拿十萬大鈔，而不肯增加貨價！歲暮冬寒，本年度的政府的財政，是不能夠再增加支出了。因此又有緊縮機構和裁減人員之傳說，這也許是「自力更生」之法吧！

提高稿費

自三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本刊稿費每千字致奉國幣十萬至十二萬元；此啓。

本刊下期仍須加價
讀者訂閱務請從速

戰火西延·全川設防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當此大別山共軍突圍，向平漢路西側竄擾，以及陳賡部的猛攻西峽口之際，四川省參議會大喊趕快「防匪竄川」，政府也在大喊人民快納糧出丁，以便建設大巴山防務，看來情勢非常的緊急，可是人們的注意力全爲每月上漲百分之四十的物價吸引去，對此相當的漠然。雖然無人願意出錢出糧出人，但政府還是在手忙足亂的準備在大巴山設防。

實際說來，四川的「防匪」工作，在去年內戰初揭幕時就在進行。那時謠傳共軍同民盟有利用土匪的傾向，秦之以西康民變，於是乎重慶行轅成都綏署，出動十萬國軍保安團隊及地方武力，剿滅了一些土匪，結果並沒有發現什麽，就算了事。後來李先念在河南被擊潰，他的軍隊散在東南西北，於是蓉渝報紙上一再的謠傳着川東北的城口萬源（部是二十一二年共軍入侵的要地）有着共軍，又說劉伯承已帶了他的幾千子弟兵回來了。一次一次的謠言都被事實攻破。可是一般人心裏總放心不下，認爲共軍的軍事將領大半是四川人（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那會忘棄他們的有價値的故鄉？

近來大喊大巴山設防是在陳賡渡河，潼關吃緊時開始，以湯恩伯同魯克斯到四川巡視並決定恢復新津機場的使用趨於表面化，並於九日之省參議會之質詢而使其嚴重化。

大巴山這一名字，在抗戰前很少爲人提及，因爲牠是祟山峻嶺荒瘠不毛之區。抗戰中因爲敵人的幾次進攻老河口及豫西，這大巴山就爲人所注意。因爲牠是四川與河南陝西交界屛障，要想從中原進攻四川，越此山的中段，直趨四川的東北部不失爲一捷徑。現在共軍欲入四川也以走此道爲有利，因爲山脈線還寬廣，交通困難，普遍設防不可能（且川東北一帶與蓉渝交通不便，目前且無公路相通，當地駐軍兵力又復單薄。所謂大巴山，從地圖上看來，其主脈大部是在陝南境內在四川的山區，實際從松潘以東以迄於巫峽都是。設防的區域預計包括三十縣：計爲昭化、劍閣、江油，儀隴、廣元、通江、巴中、萬源、城口、旺蒼、巫山、巫溪、奉節、雲陽、開江、開縣、宣漢、達縣、梁山、大竹、忠縣、墊江、萬縣、石柱、蒼溪、營山、渠縣、閬中等，不僅四川沿邊各縣就連川中的營山、蒼溪、閬中都在內了，約略是以城口、萬源爲頂點，向內作一扇弧形而如此劃定的。防線共有二道：第一道自巫山、巫溪、城口、萬源、通江、南江、廣元、昭化、至平武，第二道自奉節、雲陽、宣顯、達巴儀、閬南部、蒼劍、江彰至北川安縣，以及綿陽第二道綿內就是成都罷了，綿陽到成都與宣漢對重慶都只有一天的路程。

設防大巴山的第一階段是修兩條公路。據云第一條公路是橫貫第一條防線的，已築竣，還有第二道公路也將在本月內完成。據說所有公路都是由人民自備工具並出力完成的。全線長七百七十公里，耗款五百億，經中央批准發下的足五十八億，另外還築有三千座碉堡。

第二階段是軍事的配置。全部防務以川軍三十九師（鄧錫侯的軍隊）爲主該師師部在成都，軍隊原駐成都以北各縣，現政在川北成立前進指揮所，由師長黃隱任主任，大約成立在廣元。指揮所除指揮該師外，在川東北另配原駐防川東及川南的中央軍兩師。閬中附近有彭煥章師一團（原屬宜昌綏署），另外四個保安總隊。駐在成都雙流的青年軍二〇三師也調到廣元以北去了。據說全部兵力爲十萬人，現在川南及西昌等地的防務已改由憲兵接替。軍隊調動緊張時，傳聞曾使用若干飛機載運至梁山廣元等地，連民航機也打過軍差。在這一段時期中，成都方面發生了一段插曲，就是鈔荒。此項鈔荒自十一月中旬到今天已有四個星期，市面上還見不到現鈔，弄得中央銀行二日關門一天，商業銀行還有被搗毀的。要想在任何銀行中取一萬元的存款或兌款都是不可能的事，市面連國家銀行的支票貼現也要十分之一二，就是一億元的支票，只能換到九千萬或八千萬現鈔所有的現鈔都到軍隊裏去了。十一月卅日運來一飛機鈔票，共四百多億，一號那天，二〇三師就提去了三百多億，軍校提去了一五〇億弄得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都沒有錢發十一月份的教職員薪津。

設防的第三階段是加緊空軍力量。除了恢復新津機場外，並在川陝邊一未宣佈名字的縣境內新築一龐大機場。新津與廣漢兩機場曾經容納過一百架超空堡壘。目前據說是空軍已加强大巴山地區之空中巡邏，藉便隨時獲取山地內面之一切情報告知地面部隊。防空機構如防護團與防空司令部在計劃恢復中。在參議會中有一位參議員對此表示異議，當向保安處長王元暉提出質詢，王氏還說不但要恢復，更要比抗戰時加强。

三者雖說是分階段作的，但是只開始時有先後，目前却正在同時並進。目下這三者的齊頭並進，可算得是緊迫至極。其實劉伯承的部隊正在平漢線信陽附近，陳賡部也還在西峽口吃了敗仗，至少在一個月以內都不會過近四川邊境，然則何以政府當局弄得手忙足亂呢？此中另有道理。原來在陝西叛變了一部份政府軍，據說在三萬人以上，由孔從周率領，杜鎭丞之死，就與此次軍變有關。這一支人馬就在大巴山附近。這一個消息，外間罕知，月前曾傳是項叛軍曾竄過寶雞，並擾及川北的青川、平武、安縣等地，後來證明不確。但是陝南的難民確有三四萬人逃到廣元來。省議會一直到昨天（十二月十一日）都還在喊「防劉匪」，那知最迫切的還是在防孔部。

成都中央日報的社論曾坦白承認「四川局勢岌岌可危，整個大局險象環生」，他們——實際也是黨政雙方的意見——「認爲嚴防共匪竄川，勝於異日在川予以殲滅」。所以政府積極的在大巴山設防，並且一面的喊人民出錢出糧出丁來保衛大巴山。但是設防大巴山能否堵住共軍呢？這很難說。黃河天塹和大別山兵牆都可以輕易衝過，那嗎十萬人守的萬里長的大巴山又豈是銅壁？所以全川各縣——尤其是成渝線以北各縣市，正進行幾項必要的措置，總計約有下列數項：（一）各縣市局普遍聯防，已實行者已有一百二十處，並已成立三十一個指揮部。川北各縣擴大縣自衛隊至九中隊，在十八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有當隊丁的義務，每三月更番一次，定本月十五日全部編成，由川北前進指揮所節制，同時全川實行四級自衛，省由保安總隊負責，行政區由保安大隊負責，縣同鄉鎭由警察負責，庶使各單位都有兵可用，而不至互相牽制。整修縣及鄉村各路，普遍建築自衛工事。（二）開放民間武力的禁令，據說將允許私人製造槍枝，收藏自衛槍械。這一點很重要。原來三十二三年攻入四川之共軍之敗退幾全是地方自衛武力强盛之結果。（三）加緊搜剿土匪，免爲共軍利用，此事正由重慶行轅及各行政區各縣擴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米蘭民

（觀察北平通信）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報都登載了一個至少是兩欄標題的新聞。那條新聞上面主要的說：據南京經濟權威分析的結果，認為是政府發行大鈔已經到了不應該猶豫的時候了。他的理由是：「目前市面稍大數額之交易，即已深感籌碼不夠之苦，如政府不及時解決，則年關日近，各業需要現鈔亦多，某時或將發生高貼水之不良現象，則政府再謀補救，將有為時過晚之感。」另外他說最近全國商業聯合會與全國銀行聯合會因鑒於市面籌碼不夠，曾三番兩次向財政當局建議立刻發行大鈔。而且他強調着發行大額鈔不是物價高漲的原因，相反地，因為物價高漲後由於實際需要不得不發行大鈔，故也可說是物價高漲的結果，最後他的結論是：「發行大鈔，政府不該再猶豫。」

好像平地起了波浪，但其實是自然的，北平的人們已經預感到：發行大鈔恐怕不可避免的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政府每次有所改革，總是「接受民意」的，那麼，這位南京經濟權威的話以及他提出的甚麼全國商業聯合會，全國銀行聯合會的要求，當然無疑地會成為政府舉行大鈔的極大理由和根據的。

事實上，這些「民意」，已為政府發行大鈔舖好了理論的道路。

一號的各報上就證實了。政府正式宣佈：「自一日起舉行大鈔，計關金一千、二千、五千，即二萬元、四萬元、十萬元三種。」同時一些政府的首長們在招待記者席上都希望人心安定，物價不受影響」。同時對乘機抬高物價，操縱市場者，他們說：「決以擾亂金融罪依法嚴辦，絕不寬貸。」

大鈔的波浪席捲着百孔千瘡的故都，請看看大鈔發行後的北平吧：

隨着一日大鈔出籠的消息後，物價普遍的再度上漲。麵粉零售每袋五十六萬，棉紗又漲三四百萬，布每疋漲七萬。但是增漲最快的還是金鈔黑市，因為金鈔是投機品，敏感性大，在大鈔發行後，物價高漲的浪潮中，他一馬當先。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數的人在嘆息，在嘆息無今後生活的無着落。街頭巷尾，人們莫不是隨時在觀相走告什麼又漲了多少倍，「什麼漲了多少倍的消息。還是「物價不受影響」嗎？

一個公務員間到家裏，會因為一點小事打罵他的孩子們。一個教授的屋子裏因為要燃一家三口的伙食費而不得不停止了燃煤的使用（請注意，北方的冬天，不生火是不行的呵！），工人在搖頭，學生在愁眉苦臉……這就是在大鈔的浪潮下人們生活的實況。這能叫做「人心安定」嗎？

北平當局，市府，警備部，參議會都忙起來了，都在想商議平抑物價的辦法，「以解民困」北平市府連日召集主管局長緊急會議，他們的「有效措施」是由警察局，社會局出動高級職員，勸導各商店停止漲價。警備部的任務是到處監視不准商人提高物價，據說這是為了配合「經濟戡亂」。參議會連日開會均討論如何抑止物價，但除了請政府設法「如何使生產煤鹽棉花之北方組成經濟體系，不再遭受剝削，以蘇民命」外，也沒有什麼好法子。

各有關當局雖然都在想辦法平抑物價，但是也都想不出什麼澈底的好辦法。這一點可以由行轅某負責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說：「大鈔發行，當亦刺激物價，但關於物價暴漲，并非局部問題，故行轅對此雖談有何對策。」

據最正確的消息，北平的糧食儲備僅僅只能供一個月的使用了。

為了明瞭這次政府發行大鈔的意義，記者曾先後訪問幾個大學的專研究經濟學的教授，徵詢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下面就是他們的看法的大概。

北大經濟系教授樊弘說：「這次政府發大鈔，好像給病人喫鴉片一樣，這個方法的合適與否是大成問題的，他認為：增發通貨，政府實際上的收入就更會減少，據他的估計，去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不過只相當於戰前的六億元（戰前是十五億、），而去年一年政府軍費的支出就相當於戰前的十億元。本來增加租稅，舉行公債，究竟比無限制發行通貨好，但是樊先生認為：在目前，政府是不會採取這兩個辦法的，因為這兩個辦法都能使特權階級利益受到損失。只有發行通貨，不但對特權階級者毫無損失，反而能使他們遭數善於投機者大獲其利。於是受苦的只有一般公務員、學生、普通職業者和一般老百姓。

對於外傳改革幣制的說法，樊先生認為恐怕很難作到，他說：「整理幣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國家的預算能平衡，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是不存在着這個前提的。」

從整個經濟情形看來，樊先生說中國經濟已漸漸在奔潰的路上走了，他以為到那一天，人都只要貨，不要錢，那就是經濟崩潰的日子。美援，在樊先生看來，僅僅等於強心針，是挽救不以中國經濟危機的。

北大經濟系陳振漢教授首先肯定了「內戰繼續打下去，開支不能減少，財政不能平衡，永遠沒有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的論點。其次，他覺得政府這次發行

大剿辦中。其中綏靖保安處剿辦者，本年秋季以來，已格斃匪徒數百名，俘獲二千名，機槍迫擊砲甚多，同時期內行轅也擊潰了每股五百名以上的股匪十多股。

看來四川對共軍之入侵像是即將完成各種準備了，可是能否截共軍於川境以外。尚待事實證明；而共軍之必然侵川，是無可置疑的，因為陳賡已打出川陝鄂民主聯軍」的招牌。雖然我們在此刻無法斷定共軍之能否入川同將來的勝負如何，但是雙方的優良形勢我們可能加以推知的。共軍的有利點在：一，四川的國軍兵力單薄。二，四川的民盟份子多而有潛勢力，這些人大都是同情共軍的。三，四川的土匪多，共軍可與之取犄角之勢，而牽制政府把握住的地方武力。四，在政府的經濟政策之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共產主義者的有力對頭中產階級大都淪為貧窮，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賀龍徐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於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憎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戰蹟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縣禰，總願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大歡迎以澈底破壞經濟為目的共軍的。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堵住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住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寄）

大鈔，在減少發行成本上達到了他的目的，（因爲在現在一萬元與十萬元大鈔，其印刷成本并沒有多大差別。），但是在整個財政收支平衡上說却不能成功。因爲只要是內戰繼續打下去，社會愈不安定，物價繼續漲，政府只有支出，沒有收入，鈔票更不値錢，即令再出百萬大鈔，也仍舊無濟於事

燕大經濟系饒毓蘇敎，說：「此次政府發行大鈔，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爲目前物價高漲，不管作什麼總是以千以萬計，用小票太不方便了，不過問題在大鈔發行以後的效用究竟怎樣？」饒先生以爲目前政府若干負責人談的辦法都不大實際，卽會要控制那些投機取利，操縱市場的人，那是那些人又多是有靠山的，誰能動他們的毫毛？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爲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樣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以只要是在目前這種內戰局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談到今後公敎人員的生活，饒先生說：「如此下去，公敎人員生活只有走上崩潰的一條路！」

由於大鈔的發行，由於物價再度作直線的上升，此刻北平一般公敎人員的生活都將瀕於危險的境地。不久前，北平各中學敎員因待遇微薄，「集體請假」而罷敎的浪潮剛剛消失，最近，請華講師助敎又因待遇不公而沉痛的罷敎一次，這兩樁事雖都已成過去，然而面對着今次這樣困窘的生活局面，他們又將怎樣呢？

人們都擔憂着燕大敎職員的待遇又調整了，（敎授中最高薪俸可得一千五百萬元。），但是燕大的敎職員們的生活在物價咄咄逼人中并沒有特別改善。在北平公敎人員中，他們不過是比較幸運一點罷了。

有一個老敎授曾以最近法國公務員罷工爲例，他象徵着這種情形到不得已時，恐怕也要發生在中國。

再看着大鈔浪潮下估着不少數的北平學生罷吧！

國立學校如北大、淸華，雖然大部同學都領有公費。但是由於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淸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爲他們配給實物，因爲他們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欸寄卽令增加了公費，還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被響應，今天正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醞釀着。

這是北平學生在天寒地凍，北風凛冽的日子裏，唯一的呼聲。

風在吹，雪花飄，由於長時期的不安定，北平，這座名城已經呈現出了百孔千瘡的破斷[illegible]垣。加之這次大鈔的發行，物價的再度高漲、人們對生活都有了絕望的感覺。大館子里也許還不乏少人在揮霍，戲院子里也許還不時實告客滿。但是這是少數，當你看到那些拉黃包車的，那些踏三輪的，那些困難於維持一家老少生活的公敎人員，那些穿破衣的費學生，臉上的表情，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對現實生活是有着多麼悲痛的感受，而且，對現實生活憤懣的在掙扎着。

大鈔的浪潮席捲着北平，但人們深信總有一天這浪潮是會退去的！

（上接第二頁）　眞有望塵莫及底感慨。坦白底說，爲了解決生活底高壓，我祗好利用運輸工具底方便獲取維持最低生活所需底費用，我用事實和賄賂，獲得了直屬長官、指揮和檢查機關底默許，因爲他們和我一樣想活下去。雖然明知這是犯法底行爲，會遭受法律底制裁和輿論底指責，但，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撫慰我求生底慾念呢？離開現職是最妥的，可又不可能，軍籍册就等於賣身契，誰叫你穿上二尺半呢？

西北行轅運輸檢查組，九月十一日在奇台槍決了因犯利用軍車挾帶麵粉底貪污罪底獨汽某營一個少尉和一個駕駛兵。他們犯罪底動機是爲賠償承運失耗底馬掌（在新疆承運軍品，如有失耗，要由駕駛兵賠償）及開支食宿和修車費用。當那駕駛兵李志成被執行槍決時，身上僅餘新幣四萬元，且尚未全部償淸因工作上所負底債務。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却有較這更鉅額底私貨混過去了，事實昭示「財能通神」。在迪化也曾發生過數目相當可觀底公用事業鉅額舞弊案，主犯却因當局某公底偈帶關係而逍遙法外。這種撲蠅縱虎底懲治貪污把戲，使人們泛起了不平和憤怒。這種不敢正視現實而捨本求末底可憐手段，是否就能使運輸紀律好轉，沒有人敢斷定。

每天一萬二千元（合新幣二千四百）祗出差費，既要吃飯住店，又要負担修車和應酬底費用，卽使把薪餉也貼進去，事實上也是不夠底。本來出差可自帶主食和副食，可是，多數聰明底長官都用出差可以活動底理由而不發了。事實擺在眼前，出差是幸苦且困難底，但不出差却更難過；薪餉既少，長官有整理營房要扣錢，辦公費不敷要扣錢，長官有婚喪喜事也要扣錢，七扣八扣，剩下底薪餉，有時連購買日用品和理髮洗澡都不夠。況每月十餘萬元（合新幣僅二、三萬）底副食費，買了油就不夠買菜，自然是吃不飽，如果是有眷屬底話，那眞是無法混了，出差要犯法，不出差又怎辦？

在犯法中求生呢？還是坐以待斃？我祗有選擇前一條路，因爲我雖利用公家底運輸工具，却也爲公家維持着運輸底任務，如果和我一樣底人，都採取後一條路，我敢說會使目前運輸工具底半數失去效用，因在邊疆器材補給缺少，何況又一層層底轉折，配用到車子上的能有幾多？我覺得我底行爲要比較那班掛着淸高虛僞幌子底貪官污吏，來得光明和坦白，雖然不能獲得法律底恕宥，但，如果政府沒有辦法解決我底生活問題，我祗有繼續把生命和名譽作爲求生底賭注。

爲了控訴這不合理底現實和表明邊疆生活底苦悶與精神底痛楚，我盼望　先生這能把信發表，使人們了解在犯法中求生底小兵底心情，以及一個人明知犯法而不得不犯法的原因，

伯識　十二，六，　哈密

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就不應當活着？

編者先生：在我們學校（國立×中）底，凡是熱心服公務的，有正義感的，對貧民或窮困的同學有同情心的，富於進取心的，精明能幹的，甚而愛好文藝的同學……卽被很少的一部分人物加給他們「左傾」或「共產黨」的頭銜。我還沒有得到這兩個光榮的「頭銜」的條件和資格。可是在近兩個禮拜以內，我收到了兩封不具姓名的黑信。第一封，說我是民盟盟員，必須把我驅逐學校去……。第二封，就來了恫嚇，要在一個月內，「不是魚死便是網破」，並且向我聲明，他們在這裏有十三人，要我晚上小心我的腦殼。他們有的是刀子……。編者先生，我不是怕死的懦夫來向你問卜，而是：他們也知道我不是共黨黨員，但是，憑良心說，我也不是民盟盟員，而僅是有點良心，有點正義的青年學生！是否有這點良心，有這點正義的人，就不應當活着？先生，由此觀之，國民黨將來能吸收到什麼樣的份子？什麼人再自願加入青年團也可想見一斑了！

羅特　十一月十四日　陝南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通信）

劉建緒

安平先生：我自從主持閩政以來，就注重於農業復興的工作，認爲惟有從農業復興的過程中，逐漸把各項生產事業推動起來，纔是當前我們這個農業社會促進經濟建設和走上工業化途徑一個比較切實而有效的方法。但因人才、經費、時間等關係，我的理想至今未獲充分實現。最近看到貴刊三卷三、五、六各期刊載留美青年農業專家李克佐等八位先生「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及有關的另幾篇文字，覺得和我意見相同。我很希望獲得這八位有智慧有熱情的青年合作，在福建以新的方法試行農業的改進。因此，願將福建省政府過去關於農業方面的措施和我的意見作一簡括的敘述，敬請先生毆正，并希轉告這八位專家，作進一步的商洽。

福建農業建設，始於民國廿二年，而全盛於抗戰初期。當時在省有農業改進處及其事業與試驗機關不下十餘單位。在縣有普遍設立的示範農林場或農業推廣所。另外還有隸屬省研究院的農林研究。組織重疊、人力財力分散，反而鮮有實績。我在三十年九月接長閩政後，對於這個大而無當浪費多效用少的機構，便決定加以合理的緊縮：在（一）農業行政與技術機構確切配合，（二）節省不必要的人事費、辦公費，儘量充實事業費這原則下，逐步調整。現在僅有省級的農業改進處，農事試驗總場，和爲着適應實驗上不同的需要，在重要區域所設的三個分場。縣級也只在較大縣份（能籌得相當財力的地方）設置農業推廣所，從事試驗和推廣的工作。這些機構調整後，原有業務歸併，力量集中，在試驗和研究方面，確已增加不少成績。但是推廣方面效果還不很好，不好的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正如八位先生所說，就是這些機關依然未能與農民打成一片。

在農業的改進上，戰後我們已根據戰時增產積累的經驗，發乃全面的策劃。我們盡到一切可能，力圖發展，除了農業技術的改良以外，會撥出十萬擔特種積穀，貸與農民與修小型農田水利，五萬担特種積穀舉辦換種，推廣優良稻麥品種，還運用行總的救濟物資和社會力量圍墾海塘，藉以擴充耕地面積。由於這些努力，福建的糧食產量得有顯著的增加。現在寧德縣西波塘，面積約一萬餘市畝，和福清縣天寶陂一帶海灘荒地，面積約一萬餘市畝，即可完成。還有類似的工程好幾處，或在計劃或在進行中。此外，閩江流域的水電工程正在開始，預算明年年底可發電八千瓩。那時閩江兩岸一部分農田，就可得到電力和灌溉的便利。這些工作，都還是爲着擴大我們農業改進的基礎，至於如何爲農業的新生命畫下一條正確的路線，我們正在繼續研究試驗中。

自然，發展落後的中國農業，土地改革是一個極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建設新農業的試驗便以實行土地法爲重心。我們依循　國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不顧任何困難，在福建發動了兩種措施：第一是在閩西的龍巖縣實行扶植自耕農政策，將全縣土地分期分鄉收購，配給農民，使現有的耕作人僉能以溫和的手段取得耕地所有權。這項工作，推行甚爲順利，今年年底即可全部完成。第二是組織保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爲主體，集體向地主租地，有權優先租地。政府儘量給他們以經濟上和技術上的援助，誘導其合作經營，從而提高生產力。這是今年才創辦的，現在已在全省各縣指定地區積極實驗，計已成立一百二十四社，社員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八。內包括佃農十分之七，自耕農十分之二弱，半自耕農十分之一強，共有耕地一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畝。成績如何，一時尚難預料。

以上是目前福建農業建設的一個輪廓。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農業的改進，單單從事技術改良而忽視土地問題，固然是「舍其本而求其末」，鼓不起農民改良生產的熱情，使他們不願接受也無力接受一切新的技術。單是分配土地而不徹底改革經營方法，耕作者取得地權以後，細碎經營的缺點依然存在，或且加甚，則農民仍被束縛於小農場內，不獨生產不能增加，生活也還是無法改善。拿龍巖縣推行土地政策的實際情形說，該縣可說已全面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因農村人口過多，耕地分割細碎，每家農場平均不過五畝地，推廣的技術，就難得到良好效果。所以，「耕者有其田」的實行，不能只做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統一就算了事，接踵而來的新的任務，必需是如何使生產由細碎的變爲集體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土地改革，其作用應不僅做到分配合理爲止，還要達到發展生產力的積極目的。八位青年專家所建議的以生產農場的辦法，推行農業新技術、實施機械耕作，確是一個完善的計劃。在已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福建龍巖，更當合需要。因爲他既可實際領導着已經分割田地的農民，暫斷的知識技術，從小農制向中農制或大農制前進，又可糾正了過去農事機關與農民脫節的嚴重錯誤。

還有一層，我以爲農事機關所以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原因可作兩方面分析：（一）是農事機關自身不健全，推廣工作做得不夠，引不起農民的興趣和信賴，（二）是農人根本不願進農事機關，這類機關縱然辦得好，試驗有成果，農民總以爲花的是公家錢，不惜工本，不信這是普通情形所可做到的。任憑農業機關如何勤懇的勸導，乃不肯效法。從這兩種病態探求對症的良藥，我們需要今後農事機關以更適宜的方式，接近農民，爭取農民的信任；更需要大批智識耕作人，在廣大的農民面前，應用一切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展開改進農業的工作，成爲打開新農業與普通農民之間所有隔閡的一個橋樑。這是我對生產農場的建議表示贊同的另一個理由。

在原建議中，對於政府僅要求消極的保障，據我個人的經驗，曉得這是不夠的，技術改良必須取得政治的配合，才易收效。否則，縱使成功，影響也是非常有限的。在福建，我可以提出保證，一切需要的保障和政治，經濟的配合都可取得。假如八位青年專家願來這個氣候溫和土壤適宜環境安定而富美的東海之濱試驗他們遠大計劃，福建省政府願意劃出下列幾個地方供給選擇應用：

（一）福清天寶陂一帶海灘荒地，面積約一萬餘市畝，即可種植農作物，環境靜美，交通方便。

（二）龍巖縣的農場，面積雖不很大，一切都是現成的。可全部撥供使用。政府還正計劃在該縣荒草湖興辦水利工程，預計完成後可得良田六千市畝，將來也可撥給試驗。龍巖是閩西南的交通孔道，水陸均甚便利。

（三）莆田縣笏石的濱海墾區，面積約兩萬市畝。

（四）漳浦縣大鼈拔農場，面積約五千餘畝。

以上兩處利用來辦理集體或合作農場，都極適宜，交通條件也很具備。

（五）寧德縣的西陂塘，面積約一萬市畝，全屬地方公有，只待復塘工程完成，即可招收墾民養淡開墾。如果有人願來墾殖，并擔負給與其他墾民以技術指導的責任，或指導墾民試辦合作農場，均可獲得省政府一切的幫助。

此外，我們對於新農場，一定籌給充裕的資金。如果顧慮到試驗會遭遇人事上的影響，更可用契約作保證。儻使八位青年專家認爲福建農業還可以打開一條新出路，並且同意我的意見，那末就請他們直接寫信給我，提出更具體的計劃，開列所需的幫助（如購買農具種子費用等），以便在他們到達以前，雙方都有充分的準備。請將此信和附件轉交他們。順祝

撰祺！

劉建緒啟　十二月五日

編者按：劉先生原函及附件七件、業已掛號寄美。我們順便報告：兩月以來，凡是讀者有信託我們轉寄的，我們均隨收隨轉，並希各位託件人釋念。

爐邊天下

蘭茵河底的魏瑪陰影

費孝通

黎翁·勃魯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裏陳訴的聲調是陰沈，抖動，和悽厲的，使人記起他五年前，在呂奧姆，貝當的審判官面前，陳訴的聲調。當他已成階下囚時，他用這陰沈、抖動，和悽厲的聲調，並不是想說服早已打定了主意的審判官，也不是想呵責出賣祖國的維琪政權，而是在陳訴他對法國傳統民主的信念。他不滿於法國布爾喬亞，這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懦弱，在還有着爭鬥機會，還沒有絕望時，已放下了武器。他的心寄託在不會屈服的法蘭西的人民，雖則當時，一片黑暗，純粹的魔掌壓制了一切，勃魯姆在監獄裏盼望天明。他絕不會想到，在他劫後餘生，在所盼望到的天明裏，還會再度用着呂奧姆陳訴的聲調來警告法國人民。

他在國會前受考驗，組閣的大命已降到他身上，要他再做一次像去年冬天一般的穩定內閣。但是今年冬天已不是去年的冬天了。去年冬天法國的背後是英國，那時美國似乎還以為英國有力量在歐洲弄出個秩序來。勃魯姆訪問英倫回去，宣布壓低物價和穩定工資的政策，居然有一時的成效。我那時在倫敦，勃魯姆的聲價赫赫。中間路線似乎很足以左右逢源地自處於兩大之間。我記得我回國後不久，曾說起過我們中國應當向法國學習的話，曾何幾時，法國竟步上我們的覆轍了，那是因為今年冬天法國背後已不是英國，而是美國了。

勃魯姆豈不知道景隨時遷。俯仰之間，已非曩昔？他死心眼地還是要走中間路線，要求農民和中產階級犧牲一點利益去滿足工人的需要。在法國戰後，負起復興責任的主要是工人；富農們窖藏食料，走黑市高價出售；資產階級投機謀利，操縱黑市，這是公開的祕密；從英國到法國去的人回來總是說，要什麼有什麼，祇要拿得出法郎，（美金當然更好）。——這種情形，在我們本來沒有什麼希奇，祇有英國人才大驚小怪，當件事說。但在勃魯姆看來這是不合理的，而且不能持久的。工人們會反抗這種不合理的情形，反抗的手段是罷工，罷工會使生產停頓，復興計畫受到打擊。

法國的布爾喬亞沒有因戰爭而變質，還是短見、懦弱，和自私。這性格，勃魯姆是最熟悉不過的，他吃過他們的虧。但是何以去年冬天，他居然能暫時把局面穩定下來的呢？那倒不是勃魯姆手腕高明，而是這些資產階級被逼低了頭。那時共產黨的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成了最大的政黨。如果資產階級不放鬆一點手，把物價壓一壓，罷工一起，說不定共產黨就可以獨占政府。於是他們聽命於勃魯姆了。英國更支持着他。英國還在夢想一個「社會主義的中間地帶」，勃魯姆是個合格的盟友。

現在情形不同了。英國已經洩了氣。歐洲的乾坤讓給了美國去擺佈。退出希臘是第一步，讓出德國是第二步，英美換了防，法國背後不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了。馬歇爾計畫接替了杜魯門主義，把法國正式裝點成了美國協同體裏的一員角色。法國的布爾喬亞很快的明白他們已沒有向工人讓步的必要了。他們本來怕共產黨會利用工人生活的艱難擴大勢力，獨占政權；現在美國公開向全世界一切共產黨挑戰了，決不會坐視法國赤化。而且以往如果要改善工人生活，非得向富農及資產階級身上想法，現在馬歇爾計畫裏有着一大筆款子，正可把這改善工人生活的費用開到外債帳上去，自己不必管了。這種想法自然使勃魯姆的王牌失去了作用。

勃魯姆知道這些資產階級見錢眼開，民主，愛國等名詞對他們是沒有內容的。但是他卻看得到法國的危機，這危機並不比七年前輕：那時將要滅亡民主法國的法西斯力量是在外邊來的，現在同樣的力量卻在內滋長。他明白法國不屈服的人民必然會拒絕以美國利益作中心的債款，但是資產階級自身的復興卻依賴於這債款，於是這債款也不易避免成為分化法國的觸媒，分化引起爭鬥；不論爭鬥的結果怎樣，左勝也好，右勝也好，民主傳統卻完了。——這至少是標榜中間路線的勃魯姆的看法，於是他回復到他五年前受害時的聲調了。他明知這個國會不會支持他，即使支持他，國際的局面也不容許他依着中間路線進行。以前是左右逢源，現在是左右為難了。準備協助勃魯姆的雷諾說：「沒有政府可以在兩線應戰的」。

有人，假如勃魯姆二十一日信任投票前，不抨擊戴高樂，他的內閣是組得成的。但是沒有讓步，結果是以缺少九票之數而失敗了。他不願做許曼。這祇是法國內部糾紛，甚至內戰的信號。繼續這信號所發生的一串故事，過去近一個月來，歐洲的熱鬧場面，雖則已經幾次占據了國際版的頭條新聞，但是其間的演化卻好像是邏輯的演繹罷了。普通觀察家都預料得到的，左右開始火併了。

不祥的預言已經在各處放送：新政治家周刊向許曼內閣說：「巴本並沒有維持多久」，論理周刊說：「他（許曼）是個保守的天主教徒，極像魏瑪時代德國的白魯寧，一片好意地為希特拉築路」。——在這些評論家的心目中法國的希特拉是誰呢？那就是被維辛斯基公開指責為戰爭販子的美國杜勒斯，馬歇爾的顧問，特地到巴黎去晤談的對手，戴高樂。許曼是否再度扮演巴本或白魯寧，大概在明年春暖花開時節就會揭曉。我並不太相信歷史會重演。戴高樂或者很有意重串個世界舞台的反角，但是這反角能否上台還是個難於預測的謎。

兩週的大罷工，創造了二百萬工人放下工具的高記錄，而又能在短期內復工——那是表示許曼內閣鎮壓住了工人勢力，還是工人給許曼一個下馬威，看看顏色？（給許曼看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威是示給躍躍欲試的戴高樂看的，不，其實還得遠一點，是示給在倫敦開外長會議的馬歇爾，和在華盛頓國會要討論援歐計畫的議員先生們看的。）我想我不必回答這問題，馬歇爾，杜勒斯心裏明白就夠了。

在我們旁觀者看來，這種左右火併的方式究是件不幸的事。有人可以在第三勢力走到窮途末路之時，拿出列寧的話來說，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本來沒有立場的。到革命形勢已經造成了，中間人物自不能夾在火線裏倖免於兩面的受攻，但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革還是可以採取和平的方式的。放棄和平方式是不幸的，雖則可以是無可避免的。

正在處於兩大之間的國家，一個繼續一個的，走上內戰的路上時，英蘇的商約締結的新聞卻隨着法意罷工結束的消息傳來了。像我這種曾被譏作「善於幻想和平」的人，還是不能不對這類事特別看得重一點。這不但是個富於啓示性的協定，而且這協定締結經過很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國際變動的風向。

英國內閣裏包含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貝文——亞力山大等外交軍事的看法，那是偏美路線，也可以說是向西拉攏主義。這路線有着傳統的根據：大英帝國過去一貫的外交政策有三個鼎腳：一是以優勢武力控制殖民地，二

是維持大西洋的和平，三是分裂歐洲。主要是第一脚，英國的經濟基礎在商業。控制貿易區需要力量，從地中海到印度洋，伸到遠東。這方面要費力，另一方面就得節省，大西洋兩岸得聯絡好；加拿大是自己人，美國是遠房兄弟，大西洋上風平浪靜才能使帝國力量向東發展。歐洲是英國潛在的競爭勢力，所以得加以分裂，使歐洲國家互相消耗力量，不來和帝國找麻煩。

可是英國經過了這一次戰爭，情形改變了，他已沒有力量去維持原有帝國的格局。在過去一年中，印度、緬甸、埃及、中東、希臘、意大利，甚至德國占領區，一個一個地吐了出來，因爲如果他要維持，人力財力都不夠應付，結果會掙扎了半天，連國內的經濟都給拖垮了。這一退，使他們沒有理由再繼續傳統的外交政策了。但是轉變一個傳統的政策是不容易的，所以新的看法過去在內閣裏所占的分量不太重。站在新看法那一方面的，也是被稱爲進步的，人物是不久之前因爲失慎而辭職的唐爾頓和現在執着經濟大權的克利浦斯。這兩位本來担負着財政和商業的責任；從經濟着眼，英國的出路必須減輕維持帝國排場費，加緊復員，增加生產力，和展開和歐洲的貿易。換一句話英國立國基礎，在他們看來，將換三個鼎脚，一是增加生產，二是清算帝國，三是聯合歐洲。

自從金元荒之後，進步的看法逐漸獲得了人民的支持，當時商業部長克利浦斯就派了次長威爾遜，這三十一歲的青年政治家，到蘇聯去談判商約。克利浦斯在戰時曾到過中國來，他的眞正目的地却不在中國，而是在蘇聯；他以繞道回國的藉口，訪問了史大林，而奠定了蘇聯和聯合國的合作。所以他在一般人眼中多少是聯蘇的象徵。但是威爾遜初訪蘇聯却毫無成功而返，功虧一簣的原因是在馬歇爾的哈佛演說。英蘇商約的停頓表面原因是說麥價太高，（因爲蘇聯附帶要求豁免一部分戰時的債務，）和蘇聯所要的英貨英國無力按期製造。實際的理由是英國怕得罪美國，損害了再舉美債的可能。貝文還想做最後一次努力，從美國得到困難的解脫。

談判停頓了幾個月之後，英國內閣改組了，經濟權全入了克利浦斯的掌握，威爾遜也繼克氏作商業部長。這任命其實已透露克氏並未忘情於蘇聯的糧食。馬歇爾計劃熱鬧一陣，這「仲夏夜之夢」一覺醒來，已是秋深，嚴冬日近，而這位威尼斯商人對英國顯然除割肉外並不準備其他條件，而且即使英國能在馬歇爾計劃中分潤得着一些，也得在明年春後。這嚴冬的糧食從那裏來呢？貝文的「小麥計」政策並沒有帶來足夠的麵包。麵包不夠，工黨地位動搖，這形勢逼着艾德禮走克利浦斯的大陸路線了。

耐人尋味的是威爾遜的再訪蘇聯是正在馬歇爾在倫敦開四外長會議的時候。外長會議還沒有結束，馬歇爾爲了法國罷工在頭痛，杜勒斯自告奮勇，去找戴高樂會晤之際，莫斯科却傳來了英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好消息：「蘇糧即將運英！」一百萬噸糧食可以使英國結束麵包配售制度。這少壯政治家眞有閃電手腕，在一星期之內商定了這大筆買賣的原則，——不但糧食市場將有廣泛的影響，芝加哥投機商爲之變色，而且整個政治市場恐怕也不會沒有深刻的影響；爲之變色的人，到處都有。

威爾遜在「衆院掌聲雷動中宣佈：蘇聯價格和主宰目前世界市場的價格相比，實在非常公道，非常客氣。」主宰世界市場的就是芝加哥的投機商人，也就是美國外交的後台之一。

好像是打開了一道水閘，這類消息如湧而至：英荷貿易談判繼續了，荷蘭派代表去蘇談貿易了，蘇捷簽定貿易協定了。這一聯串的消息中却來着一個相反的插曲：「蘇聯中止與法貿易談判。」在談判中的輸法食糧有一百五十萬噸之巨，這個談判一旦破裂，許曼內閣是吃不消的。當我寫這篇「縱邊天下」時，許曼已經在着急，指令在莫斯科的代表不能接受這停止談判的建議。顯然的，這是政治，不是生意經。許曼怎樣應付是值得注意的。許曼如果不能支持下去，戴高樂能麼？馬歇爾有多少力量來穩定法國？法國人民爲什麼要出高價來向美國低頭，而不派個「威爾遜」去簽個又公道又客氣的商約呢？

勃魯姆內閣果然沒有組成，但是他這篇陰沈、抖動、和悽厲的陳訴却打入了每個不屈服的法國人的心頭，戴高樂能否成爲希特勒還是一個謎，也許祇是萊茵河底一個不可捉摸的陰影罷了。

十二月十七日清華勝因院

（上接第二十頁）翻遍衣櫃，到處找尋。誰要和他做交易，必須自己先認吃虧。他從來不讓誰嘗他園裏的無花果；甚至不准別人走過他的園地；不僅如此，就是掉了橄欖之類落在地上，亦不許別人去檢。他每天都去察看他的田地，看到四圍的籬笆仍在原處，他才覺得放心。要是有人欠他的債，過期一天不還，他就利上加利，决不通融。如果他宴請衆賓客，就將食物切得又小又薄，親自分配給他們。他上街去，往往空手回家，一樣東西都沒有買。他嚴禁他他的妻子將燈心茴香草藥或大麥餅，或祭神時宰牲用的包頭布以及放在神壇上面的聖餅，借給別人，因爲他說：「這些零碎東西，一年到頭，總算起來可就不少」。

總而言之，這類傢伙的貯藏室裏積滿塵土，而他本人，腰裏掛着一串生銹的鑰匙，穿着很薄的外衣，油膏塗得很少，剃頭一直剃到頭皮，中午拖着鞋皮。假如你在漂布店裏碰見他，他一定正在叮囑漂布店的老闆，漂他的衣服不要節省漂布泥，免得過不多久又要來漂。

迷信者

迷信就是畏懼鬼神而至失魂落魄。一個迷信的人，在聖泉洗了手，廟裏灑了聖水，嘴上嚼着桂葉，整天走來走去，總是嚼着不放。要是路上有隻伶鼬經過，他就裹足不前，一直要等到別人先走過，或者他撿了三塊石子從路對這邊扔到那邊，他才往前走去。要是他在家裏看見了蛇，他就在那塊地方修起廟來。假如他在三叉路口看見祭神的石頭，他就連忙從絨袋裏掏出油來倒在上面，然後雙膝跪下，膜拜而退。偶而有耗子咬破了他的麵粉口袋，他就跑去問先知應該怎樣辦法，假如先知隨便回答一句：「你拿到修補店裏去打個補綻就是了」，他就覺得事情相當嚴重，連忙趕回家去，將那口袋當作寶貝一般供奉，不再輕易應用。他經常忙着淨滌他的房屋，因爲他說時有妖魔光顧他的家中。假如有貓頭鷹飛過他的走道，他就嚇得面如土色，大聲嚷着『你瞧，智慧女神來了』！他很小心，决不踏上坟墓，走近死屍，跨進產房，他說避免這類不潔之物，對他大有好處。每逢每一個月的四號七號，他給全家人預備下麥酒，燙熱加上香料，親自上街去買桃金孃和乳香，回來之後，整天就忙着給神像加冠。只要他做了夢，他就跑去問預言家或詳夢者，他應該去求拜那一位神或女神：他在參加祕密祭之前，每一個月都用聽訓，有時帶着他的妻子，有時帶着兒女以及奶媽一同前去。

每次走過叉路口，他必洗頭。他家裏舉行特種淨滌時，他常邀請幾位女祭司來參加，當他恭恭敬敬站在女祭司中間，她們就給他一根葱或一隻小狗。假如他碰到一個瘋子或是突然發病的人，他就嚇得渾身發抖，胸中作惡，吐。（陳虞竹譯）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作

蕭夫拉司徒斯（Theophrastus, d. 278 B. C.）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之弟子，後繼其師講學於雅典城外萊樓翁書院（Lyceum）。平生著作甚富 有植物學九卷蔬菜學六卷傳於世。然其最大之貢獻，則爲短小精悍犀利深刻之『人物素描』三十篇。蕭夫拉司徒斯曾函友人破利克勒斯（Polycles），述其著作經過：

『在一個民族之中，如希臘人，雖然住在同一地方，受着同一教育，而人的言行舉止，却無一相同，每當我追究其中理由的時候，總是不勝惶惑。

『你知道，好朋友，我對於人性，向來喜歡精密觀察；我現在九十九歲；在此數十年中，我曾與各色人等親密交談；而於每一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的言行舉止，未嘗稍加忽視。本此經驗，我來描寫人各不同的性格特徵，諒無不宜。因此，我就陸續描寫各種人物的日常行爲以及所謂習慣動作，呈獻給你』。

『好朋友，我深信，這類作品。對於後世之人不無裨益；我們看過這些好榜樣與壞榜樣之後，立刻知道嫉惡如仇，從善如流，而無愧於賢德的祖先』。

『現在再說我的作品；請你依照我的步驟，判斷我的觀察是否正確。閒話少說，我就開始描寫偽君子；根據我的原定計劃，第一步先解釋名詞；然後描寫那類人物的言行舉止。我想應用這種方法，依據每個人的特異之處，表現與人性有連帶關係的各種特性』。

這部作品，不僅對於當時喜劇大師梅南德（Menander）貢獻甚大，而於英法等國小品文中之人物描寫，影響亦至深且巨，如 Joseph Hall, Sir Thomas Overbury, John Earle 與 Jean de la Bruyere，所作『人物素描』(Characters)，無不師承其法。此書有 Jebb 英文全譯本，遍覓不得。茲據 Grant Shoerman 所編 Century Readings in Ancient Classical Literature 中無名氏英譯節錄，重譯如次。

偽君子

偽君子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種圓滑手段，藉此隱藏他的惡意。這一類人，走到他的仇敵面前，故意大講交情；他分明正在暗算別人，可是當面却又勸假奉承，看到他們遭遇劫難，便去慰問他們；對於曾經毀謗他的，他當衆饒恕曾經罵他的人；他逆來順受，唾面自乾，凡是有人因爲被他暗算吃了大虧而十分怨憤的時候，他就用甜言蜜語敷衍他們。

如果別人有所要求，偽君子一向慣於閃鑠其辭，避免直接答覆；譬如有人特地找他商量一件緊要事情，他就說『你明天來找我吧』。避免人家追問，他總設法推托，說是剛從遠處回來或是昨晚方才到家，或是近來多病，不談生意。他從來不肯承認他曾經投資貿易，只對人說，關於那件事情，還在慎重考慮之中。假如有人向他借錢，或是來收他的捐款，他便說近來一個錢都沒有賺到，可是等到生意蕭條的時候，他就大吹他做買賣如何精明能幹。他假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意食言。他善於規避躲閃，巧技層出不窮；有的時候，故意裝腔作勢，彷彿正在考慮某件事情；有的時候，却又茫然一無所知；有時聽到別人的話故作驚異，有時又說正合他的意思。他慣用一套口頭禪，現得與衆不同，他常說這類話：『我眞不免要懷疑』；『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大爲驚奇』；或者，如果另有作用的話，他就說：『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一種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類話；你說的話，全不可信；你要說這一類話，最好找另外一個人說去；說老實話，我眞不知道，騙人的是你，還是他』。

但是，你得謹防這一類人，他慣用這類迷離恍惚的話，掩飾他的陰謀毒計。假如一個人的舉止行動並不單純，而他的每一個字都是經過深思熟慮，那末，這一種人，比壞蛋更壞，我們更應該躲避。

碎嘴子

碎嘴就是多話，想到就說，說個不完。有天，一個碎嘴子緊巧坐在一個陌生人旁邊，開口便囉囉嗦嗦，細說他妻子的各種長處；然又說昨夜做了個夢，接着他就大談其夢；最後又將晚餐時放在他面前的菜，一樣一樣說給人聽。說到這裏，舌頭上像是塗了油一般，說得越來越快，滔滔不絕；後來，他神氣活現，煞有介事的說：『唉，我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不知壞到那兒去了！市面上穀子的價錢，跌得 直不成樣子！這城裏擠滿了外路人！這時候，酒神節（Bacchanalia）早已過了，海上到 都是船隻；這時候，要是老天爺高興，下一陣大雨，麥子那就長得更快了』。說着，他就宣佈，從明年起，他一定親自去種地。他說：『可是，這個年頭，要想混碗飯吃，好不容易！我看，你是個外路人，所以，我得告訴你，上回過節的時候，那個玩最大一根火炬的是戴彌福（Damiphus）。說起來，請你告訴我，奧德翁（Odeun）音樂廳一共有多少柱子。昨天，我不舒服——嘿！請問，今天是幾月幾日呀』？

冒失鬼

凡一個人，他的言語舉止，用意雖好，但總不合時宜，因此人家見他，都不歡迎。這冒失鬼，一旦有事，要去請教他的朋友，總在人家正是忙得頭昏眼花的時候跑去找他。他的情婦正在生病發燒，他就去陪她吃飯。有人因爲作保而受連累，剛將罰款付清，這冒失鬼却去請他出來做他的保人；一場官司剛好判決，他却不早不晚跑去提出他的證據。吃喜酒時，他嘲笑女性。他遇見剛從長途歸來的人，便邀他們和他一路去看迎神賽會。你分明對他說過你的貨物已經脫手，他却大獻殷勤，情願給你兒一個背出高價的主顧。他站在大庭廣衆之中，從頭到尾敘述一件大家早已非常熟悉的事情。凡是遇到某種事情，當事人眞心不願意他來干涉，但又不好意思當面阻止不來插嘴，他却愛管閒事，夾在裏面纏夾不清。每逢大家正忙着宰牲祭神飲酒作樂，他偏跑去討債。假如他碰巧走到鄰人家去，看見鄰人正在打奴隸，他就站一旁，大談從前他家裏所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個僕人，亦像這樣挨了一頓打罵之後，就跑出去懸樑自盡了。假如有人請他出來，調停事端，雙方本來都想和解，可是因爲他在中間纏夾不清，反而又使雙方爭執起來。人家還沒有吃晚飯，他就去約人家跳舞。

吝嗇鬼

吝嗇鬼就是過分節省，而且省得不近情理。吝嗇鬼特地到債戶家裏，追索上月沒有付清的半文錢。請客的時候，他細心注意每位客人喝了多少杯酒；每逢祭神的時候，他的供品總是最少。他買日用的零碎東西，無論價錢怎樣便宜，他總嫌貴。傭人打破了他的鑪子罐子，他就扣除傭人的工資；要是他的妻子偶然掉了一個銅鈕扣或是一個小銅幣，他就將桌椅圖書箱櫃一齊搬動，（下接第十九頁）